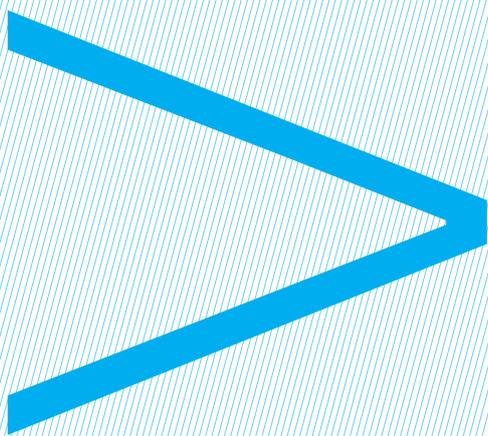


> 包容性

> 新闻

Dr. Verica Rupar and Dr. Chao Zhang  
Research assistant: Wenjie Li

XX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这本手册的出版者 Media Diversity Institute (MDI) 媒体多样性研究所当时仍然隶属于纽约大学。我们那时也只是同发展中的民主国家的记者进行合作。当时我们相信，通过提供额外且那些国家相对缺乏的技能实践培训，便足以让那些国家的记者们拥抱并接受一整套的新闻行业核心价值观——即真实、独立、准确、公平和平衡的理念。但是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将变得更加纷繁复杂。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到国家的记者，同时也包括那些发达民主国家的记者，如果想要反映这种新时代的复杂性，单纯依赖基本技能的培训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经常遭遇的挑战是缺乏正确的信息源、正确的故事创意和正确的人脉。因此我们决定与民间社会组织 (CSO) 进行合作，将民间社会组织活动家与新闻记者有机结合带来了多重益处。前者可以了解和揭开新闻职业的神秘面纱，从而在记者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可以给予帮助。与此同时新闻记者也可以获得接触真实人物、真实英雄和真实故事的渠道。他们甚至可以获得社会精英阶层不愿意公开承认的信息。在巴尔干、南高加索和北非等地区，这种合作带来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闻故事：突然之间有机会听到来自不同群体的普通人的声音，而不仅仅是来自政府官员的视角。正如一位拥有 18 年报道经验的摩洛哥资深记者所说的那样，“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我从未采访过普通人”。从那以后，记者的报道中增加曾经缺失的声音和视角便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之一。追求信息来源多样化，新闻编辑间多样化。换句话说，只有新闻编辑间的记者真正实现由来自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迥异的成员构成，新闻报道的内容才能真正实现多样化并且做到真正的包容。

就是从那时起,我们也意识到我们需要新闻学研究和教学,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新闻业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作为希望促进媒体发展进步的从业人员应当以什么样的最佳方式来回应学术研究的新发现。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者专家充分考虑到新闻从业者的实操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未来的记者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正确的知识和正确的技能,将来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备而来,能够满足和胜任新闻行业的实际需要。

在过去的 20 年中,我们与全球 70 多个国家的新闻学院合作,支持学者专家开发新的大学课程,而且也将新闻专业的学生带到新闻编辑间亲身体验。我们还与威斯敏斯特大学合作,创办了我们自主开发设计的多样性和媒体硕士课程,以应对公共话语体系中包容多样性问题所带来的各种复杂的社会议题。

目前我们的工作也不再局限于发展中的民主国家。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思潮所导致的大量假新闻和虚假/恶意/错误信息的产生,再加上社交媒体的普及和推波助澜,也促使我们的工作进一步拓展到发达的民主国家。正如一些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新闻记者已不再是新闻报道的守门员。也正在成为一种社交媒体。因此今天的记者正在成为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故事的事实核查员。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集成新闻间”的概念正在形成,当今记者制作的内容总量平均而言是 70 年代中期的 20 倍左右!因此在大学学习期间掌握正确的技能和方法对于新闻行业未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 3000 多名记者和媒体决策者合作。每当我们向媒体决策者介绍给类似《卫报》(《卫报》已经接受包容性新闻的原则)这样的媒体机构,他们经常会进一步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多元化政策。社交媒体对民间社会组织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新事物,使得他们能够直接与公众进行沟通。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那些民间社

会活动家——作为公民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发声,但是很少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也给媒体、民间社会活动家和学者们不断地提出新的挑战,必须随时应对这种新变化新情况,他们三方也都是与媒体多样性研究所(MDI)长期合作的利益相关机构。

从这本特别编撰的手册中,我对当代新闻业有了新的认知和理解,其中一点便是新闻记者不仅已经成为现实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而且他们正在越来越接近精英阶层,远离普通人群。这是近期学术研究发现的一个新现象。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我们可以清楚地将这种说法与我们在日常媒体行为中所看到的种种现象联系起来。

我们相信,这本手册与我们约 20 年前撰写的《多样性报道框架》一书一样,能够为中国的新闻学学者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同行们一样提供帮助。在此我们非常感谢手册的作者 Verica Rupar 博士和 Chao Zhang 博士,以及在本手册创作的过程中积极与作者交流慷慨分享经验的 Miklos Sukosd 博士和王海燕博士。



Milica Pestic

执行主任

媒体多样性研究所(MDI)

# X 目录

导论	>	<b>01</b>
媒体和社会	>	<b>02</b>
新闻分析	>	<b>03</b>
宗教	>	<b>04</b>
民族	>	<b>05</b>
种族	>	<b>06</b>

地域	>	<b>07</b>
性别	>	<b>08</b>
婚姻状况	>	<b>09</b>
性取向	>	<b>10</b>
年龄	>	<b>11</b>
残疾	>	<b>12</b>
社会地位	>	<b>13</b>
结论	>	<b>14</b>



# X 导论

07



媒体与多元社会的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争议最多的议题之一。大多数人依赖媒体来获取有关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信息，很多时候他们不可能亲身体验亲眼目睹，因此需要借助媒体获取各种事件和热点议题的信息。为公众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公共和政治讨论，决定了新闻媒体的功能及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但是，这一崇高任务却受到了社会关系偶发性的挑战。虽然由于表述，认知和运作方式千差万别，人们对多样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其核心思想是始终坚信差异化的存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各美其美对人类社会有益，值得赞美和广为宣扬。人们听到的声音越多元，个体和整个社会的表象思维能力就会越强，就能更好地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

《包容性新闻》手册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为依据，提供了一系列与报道多样性话题相关的议题和案例研究，手册中的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可供教师们在学习和教授大学课程时参考使用，旨在提升学生们对报道多样性议题时可能涉及到的问题的认知，增强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全世界的新闻学教育传统上通常是基于实践技巧和职业技能的培训，还有在广义上倡导培养大众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培养知情公民的教育理念。但是新闻学院具体应该教授什么知识和技能来武装学生，从而改进媒体对多样性议题的报道品质，这仍然是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新闻学院新闻专业的具体教授内容通常取决于新闻产业的需求，这是多年以来媒体研究者一直激烈争论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因为新闻产业的需求因国家而异，并且自然而然地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法律，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但是无论多么千差万别，如何在职业和学术之间，实践和理念认知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似乎依然是全球新闻教育追求的共同目标。

2007年，新加坡举办的世界新闻教育大会（WJEC）通过了《新闻学教育原则声明》。该声明指出新闻学教育的本质应该是跨学科的教育，新闻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独特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学术领域。2019年，WJEC成员组织签署了《巴黎新闻自由教育宣言》。这两份文件都宣称，新闻学教育的核心是要在概念化，哲学思辨性和以实际技能为基础的内容之间取得平衡。人们理应看到目前在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和新闻自由受到严重威胁的时代，坚持新闻的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新闻教育家们一致认为，对新闻教育的资源分配是一项长期的能力建设性投资，有助于保证任何一个社会都能够拥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和有品质的新闻行业。

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报道各种冲突性事件，政治的两极分化，自然灾害或任何其它形式的危机。为此他们需要具备充足的知识和技能，与所报道的世界及其服务的受众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他们需要开启弹性化思维，应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与他们所受的专业教育以及新闻编辑间所获得的实践训练密切相关，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将不同社会群体的真实情况在公共领域很好地展现。

通过分析现有媒体报道中有关种族，民族，宗教，性别，年龄，性取向，残疾，地域，社会和婚姻状况的具体案例，这本操作手册提供了一整套可以在课堂中使用的教学工具，培养学生对多样性议题的敏感度，提高学生的新闻内容分析能力，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并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社会多样性与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包容性新闻》由媒体多样性研究所（MDI）出版发行。它参考借鉴了MDI在2003年编写的《多样性报道课程框架》手册。该手册由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撰写，主要从四个领域提升学生对报道社会多样性问题的认知。该手册为教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议程大纲，列出了课程要点，为课程的教授提供了基础的方法论。

编撰该手册的目的是希望能作为新闻院系的专业教科书使用。它是依据中国目前的语境和社会背景编写的，但手册中包含的具体内容和案例也对其它地区的新闻学教学同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一部分介绍了该手册采用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在“媒体与社会”一章中，我们对媒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新闻工作者处理，呈现和促进多样性问题的方式进行了综述和批判性的研讨。《包容性新闻》通过讨论一个社会系统在面对紧张，冲突和逆境时的反应，及其调整和蜕变的能力，批判性地探讨了新闻业在社会中应处的地位。手册第一章系统梳理了后文展开分析时需要用到的理论框架。第二章的题目是“新闻分析”，介绍了批判性话语体系分析所涉及的方法论，并解释了在课堂上如何灵活使用该方法论。作者认为歧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诸多话语体系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新闻记者面临的新任务是要在报道多样性问题上如何才能影响

更广泛的社会各界为之共同努力。歧视性的话语体系是由精英阶层的代表生产和掌控的，因此有必要教育未来的记者如何避免单纯复制原有的刻板印象，传递固有偏见和仇恨言论，这将是未来新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当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将会在反对任何形式歧视的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手册的第二部分呈现了很多案例分析，提供了有关种族，民族，宗教，性别，年龄，性取向，残疾，地域，社会和婚姻状况等媒体报道的具体实例解析。每章都针对一个主题进行了介绍，并简要陈述目前媒体反映某个多样性问题的相关研究，然后列举了来自中国或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案例。使用文内点评的形式对该报道使用的新闻工具进行具体分析，点明学生们应当注意的伦理判断要点。这些案例既可以在教学中使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可以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和手段，通过详细解剖梳理新闻内容来讨论与学术相关的关键知识点，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对新闻媒体在呈现，解读和建构多元化话语体系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认知。案例之后还列出可供学生们课堂讨论的思考题。

“结论”作为该手册的最后一章再次回顾了新闻媒体在建构公共讨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附录部分包括参考文献清单以及《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国际记者联盟的《全球新闻工作者伦理宪章》的原文。



## 第二章 X 媒体和社会



该手册旨在针对新闻业实践操作展开批判性的对话，让人们能够注意到新闻报道中被歪曲或忽视的角落和声音。手册将参考大量案例分析新闻文本，研究宏观社会背景下不同的群体竞争如何加剧了民族、阶级、宗教和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分歧。针对社会群体的媒体呈现的几项研究都已经证实，种族主义，偏执狂，仇外心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歧视都受到文字和言论的引导和影响，也就是说新闻记者在偏见重现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参见参考文献列表）在附录 1 中。

新闻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学者们将新闻场域定位在政治和经济的边界场域之间。通过信息推送和拉引来概括新闻实践自治与他治性之间的动态互动。这种框架对于分析媒体实践很有帮助，但对于研究新闻报道对社会变革的贡献大小相对有限。场域理论将新闻放置在公民社会的大背景中，为重新思考新闻业及其改变公民话语边界的能力提供了一种更合适的催化剂。新闻场域的逻辑（Bourdieu 2005）支撑着社会群体形成和解散的过程，涉及霸权和反霸权身份形式之间的不断冲突，在包容和排斥之间不断突破边界。处在动荡时期的语境下，谁在新闻中发表言论，谁在被议论，似乎成为依照权力体系对社会进行分层划分的一种元叙事。新闻业作为一种公共设施在公共领域的作用取决于其呈现，解读和建构现实含义的权威性。

上个世纪，新闻业快速处理信息的权威性逐渐从报道现实生活转移到报道重大事件上，使其特权优势地位愈发突出。它能够个体生活与社会现实分开，从而把个体的人变成群体的代表。通过形成和解散社会群体，并且建构彼此之间的关系，新闻媒体行业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包容和排斥的进程当中。承认新闻从业者已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远，听起来像是职业自杀。人是“现实主义新闻”的核心（Rupar 引用 Barnhurst, 2017 年），一旦记者失去与普通人的共情，他们可能会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领域。以精英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作为评估新闻行为的主要标准，是一种极有说服力且行之有效的工具，可以揭示当下新闻业作为一种职业所呈现的各种问题。巴恩赫斯特和尼禄（Barnhurst and Nerone）（2009 年）对新闻人物的纵向研究表明，以名字为标签的个人已被其所属机构取代。只有当人们代表更广泛的社会，专业或政治团体的时候，他们才会被新闻所关注。那么研究新闻的学者和新闻从业者所面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便是：这种转变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大众传媒理论研究流派（Kornhauser 1968；Dahlgren 1995，Deuze 2019）记录了媒体将世界视为某种“替代或伪环境”这一观点演变的过程，这既是操纵人类的有效手段，也帮助他们在艰苦条件下保持心理的强大而生存下来”（McQuail 2000，第 74 页）。马克思主义学派（Bagdikian 1988；Herman & Chomsky 1988）将经济所有权直接和信息传播挂钩，强调了媒体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特征。功能主义学派（DeFleur & Ball-Rokeach 1989；Dayan & Katz 1992）声称，应根据社会和个人的需求更好地解读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认为媒体的本质是自我指导和自我纠正。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派（Golding 和 Murdock，1996 年）则重点强调媒体产业的经济架构和产业动力与媒体反映的意识形态内容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化与发展理论学派（Tomlinson 1991）预设了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认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媒体专业技能，传播民主理念，驱动消费者需求以及促进扫盲，教育和医疗健康事业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者。通讯技术决定论（Innis 1950；McLuhan 1962）认为通讯技术不仅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且通讯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信息社会理论学派（Ferguson 1992）则认为，新媒体技术将带来信息社会的高度发展，其主要特征是以信息为主导，海量信息流动主宰社会，各种关系和后现代文化之间紧密互动（McQuail 2000，第 88 页）。

定义新闻的场域概念与“批判政治经济学”有相似之处，因为它强调将当代媒体嵌入到市场内，关注新闻业特别是新闻规范实践的演化，这点与“分化”理论也有相似之处（Alexander 1981）。定义当代新闻业的难点之一是它作为中介在现实与读者之间所处的位置。中介调解本身不大可能是一个中立的过程，因为媒体所提供的信息，通常被《纽约时报》描述为“适合印刷的内容”，意思是既要满足规范化新闻判断标准（从选择符合新闻价值标准的现实开始）又要满足读者的期待值（由读者的共享利益和价值观所决定）。媒体学者一致认为，“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被选择和建构，并且总会存在惯有的偏见”（McQuail 2000, 67），而这种现实的建构与社会权力，偏见背后的融合以及变化因素等紧密相关。研究媒体的学者总是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分歧：为什么要研究媒体对现实的选择和建构，这样的研究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地了解媒体和社会，以及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动态关系？新闻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现实的媒体呈现，随之而来的媒体解读和媒体报道中的现实建构都是环环相扣的，使得媒体不仅定义社会问题，反过来也会引起人们对重要社会问题的关注。新闻媒体与诸如议会，政治党派等其它场域一起被视为公共讨论的“竞技场”之一。

Stephen Hilgartner 和 Charles Bosk 于 1988 年提出的“公共竞技场模式”描述了公共政策的复杂性，某个社会问题总是与其他社会问题关联并被迫相互竞争，试图争夺受众的眼球。该研究特别关注两个公共竞技场即媒体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因为新闻和政治两个领域之间的互动界面赋予了媒体创建论坛的能力。学者们（参见 Norris 2001）指出，公共政策议程深受新闻媒体的影响。电视新闻收视不断攀升，报纸阅读量上升，上网冲浪关注大型宣传活动的人群增加，受众的媒体知识狩猎很广，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参与度也在提高。但是不同场域之间的

互动方式和强度在全球范围内大不相同。哈林和曼奇尼（Hallin and Mancini, 2004）认为，研究媒体（新闻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有效手段是要识别以大众发行的纸媒和政治平行主义（即媒体和政党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性质）为重点的媒体市场的发展情况，关注新闻业自身的专业性发展脉络以及政治体系中国家干预的程度和性质等领域。作者使用这些标准来评估全球不同的媒体系统，并提出了三种清晰的模式：“民主协同”模式，“两极化多元”模式和“自由主义”模式。“民主协同模式”（北欧大陆的媒体体系）的特征是商业媒体与有组织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相关的媒体共存，国家角色相对活跃但受到法律的制约。“两极化多元模式”（南欧的地中海国家）呈现的是媒体与政党政治相互融合，历史上商业媒体发展较弱，国家角色较强。而“自由模式”（英国，爱尔兰，美国和加拿大）的特征是市场机制和商业媒体占主导地位（Hallin & Mancini 2004, 第 21 页）。

但是，新闻场域不仅是一个生产领域，也是一个个人与群体，现实与历史之间相互作用而创建的实践社区。本手册将经验分析与所谓的“场论”框架相结合（Benson & Neveu 2005），着重通过分析记者在实际操作中遵循一整套显性和隐性的规范，来探讨新闻从业者在本体意义生产加工中的角色和作用。研究从“技术技巧研究实际上是对流程的研究”（Holbert & Zubric 2001, 第 50 页）出发，定义并解读了记者在日常报道中涉及多样性问题时，真正可以做出的实际选择有哪些。报道形式的选择，信息来源的使用，新闻采集的透明性以及报道框架的强行设定都能够显示新闻职业原则如何真正嵌入到新闻稿件，以及新闻报道与现实之间到底如何互动。该手册着重探讨的专业新闻理念是新闻从业者有史以来一直宣称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则。这并不是说其他形式的新闻报道，例如公共服务和民生新闻类或致电清谈类广播节目，缺乏影响公众辩论的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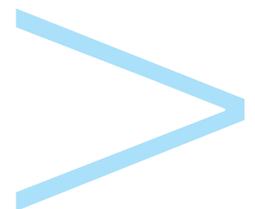
力。他们也可以影响公共舆论。但是本手册将研究重点放在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因为它对社会重要议题在公共空间和其它媒体如何呈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以下分析的目的在于展示新闻话语的形成方式和投射手段，以及与其他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理性对话的方法。之所以要讨论新闻业，是因为“新闻报道的品质对社会至关重要，好的新闻报道能够提高社会机构的绩效，促进公民对每个社会领域的理解和认知”（De Burgh, 2003 年，第 95 页），此外如果不能深入讨论新闻行业的整体规范以及新闻报道的定义标准，那么新闻媒体的社会角色问题就无从谈起。

新闻报道是指在当地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观的背景下进行的种种活动，包括大众传播者使用大众媒体来选择和处理新闻事实，并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行为。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在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新闻写作和报道风格不尽相同，遵循的规范和实践操作手段也不一样。整个西方新闻史发展的过程中，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自由一直是西方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而在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仅在中国政治的历史进程中扮演微小的角色。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标准叙事倾向于夸大追求和获取新闻自由的政治意义（Narramore, 2011）。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创立了媒体国有或党媒的组织体系。政府和执政党在媒体所有权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中国的大众传媒产业所有权高度集中（Zhao, 2004 年）。作为一种公共机构，新闻媒体属于一种社会服务组织，从事许多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以及其它服务公共利益的活动。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尽管政府经营的媒体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但独立的新闻媒体开始出现。主流新闻机构依然承担宣传的功能，从中央政府和执政党的视角报道新闻事件或解读政府政策。其他面向市场的新闻媒体，尽管与主流媒体隶属于同一媒体机构，但在选择新闻和制定新闻议程方面拥有更

大的自由度（Wang, Sparks & Huang, 2017）。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媒体机构的政治和运营体系的关键性转变促成“共识监督”模式试验并且制度化（舆论监督 - 新闻业的监督模式），既吸引了受众，也使得政府掌控具有可操作性。批评社会问题曝光政客丑闻的“调查类新闻成为当代中国媒体最有意义最具创新力的发展进步之一”（Wang, 2010 年，第 8 页）。新闻机构的经济驱动和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操守意识提升，政府和执政党也逐步承认了新闻记者对失灵的官僚主义重建和监督的作用（Bandurski & Hala, 2010）。但是，中国的新闻业不可避免地一直受到政治的影响，并可能成为政治操纵的目标。记者在寻找资料，报道和撰写新闻时的自主权通常会受到各种限制（Zhao, 2017）。有些情况下政治主导会取代新闻原则指导下的新闻实践，现在的媒体在满足特定利益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从而导致媒体公信力的降低和丧失（Wang, 2010）。



## 第三章 X 新闻分析

15



该手册的目标是将新闻业视为公共领域中意义建构的一个“独立”变量。首先，我们接纳“新闻文化”的概念，对新闻业在其所处环境中的实操展开调查，“重新思考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设定，认知模式乃至下意识期望等问题，无论记者还是受众，都认为有必要坚守新闻报道应当是现实的一种客观呈现这一基本原则（Allan 2004, p.4）。其次，如果假设新闻文化是广义社会场域的一部分，我们建议使用“场域理论框架”作为分析日常工作中媒体与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等例行做法互动的理论基础。为什么“场域”的概念（Bourdieu 2005）为分析新闻业与不同社会群体的媒体呈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场域的概念为新闻文本诞生的复杂社会条件提供了多重分析的理论支撑。它还强调了新闻生产过程其实面临各种选择（报道哪些事件，以什么形式报道，报道持续时间都需要选择），还解释了新闻生产其实还取决于每个业内人士的角色和专业等级（例如此人是初级记者，高级记者，评论员还是编辑）。从历史上讲，新闻领域本身也存在于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当中，由各种半自治性质的专业领域（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科学领域等）组成，其中存在于各个不同领域之间乃至领域内部的权力关系都可能导致某种行为的产生。“场域”概念的加入为分析新闻规范及其在媒体呈现，解释和建构社会现实这一复杂过程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典型的新闻学研究强调记者个人的方式，价值观，职业标准和实践行为，却很少提及和关注新闻话语体系的本质及其表现形式，以及它如何反映其它场域和相互的互动。事实上，研究新闻的宏观场域而不只是关注微观的个体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谈论焦点只是新闻记者，那么大家的关注点就是停留在个体责任的逻辑范畴”，但是如果将焦点转到个体所处的整个社会背景，就有机会调查包括个体在内的“整个新闻场域的架构及其内部的运作机制”（Bourdieu 2005, 第 41 页）。

新闻实践是场域构成的基本要素，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客观性。客观性更多被视为一种使命和方法，而不是指百分之百的客观描述，这里讨论的客观性指的是新闻职业的基本规范和构成新闻职业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例如在报道类似移民，民族，宗教或者种族紧张局势等复杂的社会议题时，故事正反面平衡报道的规范操作手段也可能会成为一种‘客观性陷阱’。这种规范操作不仅会给予权威信息源某种程度的特权，而且会将来自不同场域的元素进行等级区分，不同级别的因素在对抗过程中声音有强有弱。哈林提出了

一个问题，即“公众讨论中新闻场域的发展如何影响不同社会利益的现实呈现”（Hallin 2005，第 238 页），这个问题是辨别新闻职业规范的出发点，作为场域的一部分，新闻操作规范也塑造了公共空间中不同利益的现实呈现。新闻场域中最明显反映客观性规范和不同社会利益代表的元素是新闻产品本身，即新闻文本。记者在工作中使用的工具和规范以及指导他们的原则都会在最后的新闻产品上留下印记。记者的工作是清楚呈现客观事实，因此记者千方百计将“认知合法化”（Bourdieu 2005，第 37 页），也就是通过制定规则，使媒体的呈现过程合法化，更重要的是，赋予媒体设置论坛的能力。媒体术语“呈现 / 代表”指的是以新闻报道文字描述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现实的建构，因为“描述”永远不会像镜子一样原样复现现实：它需要阐释和解读。新闻文本通常被认为是比电影或小说更靠谱可信的现实表现，尽管新闻的生产过程同样受到历史、社会和职业因素的加工和塑造。媒体不可能报道所有的事件，也不可能呈现所选事件中的所有元素。事实的呈现手段也千差万别，有些事实是放在显著位置加以强调的，而其他事实则可能在报道底端一带而过；有些文章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而另一些则以访谈形式。一个记者直接使用原话而另一位则可能以报道形式进行观点的解读。

我们对世界的定义，与日常新闻的生产加工相融合，可以用来动员整个社会，并且通过同时分析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加以调整和完善。新闻场域内部存在不同形式的文化和经济资本，记者一方面在复制，另一方面也在改变不同场域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点对于媒体研究非常重要，因为所谓“常识”的生产，是新闻媒体在不同媒体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绝不是像其它方法论所建议的那样是从权力位置到常识的简单转换。

记者在日常工作中采用的一整套规范，包括需要遵守的规则，使用的工具，文字的手段和呈现方式，所有这些不仅定义

了新闻这个职业，相比更广义的社会，新闻场域本身具有自治的性质。许多媒体学者已经看到并探讨了记者对官方消息来源的依赖（请参阅 Cottle，2003 年），但是很少有学者能够解释新闻的价值判断是如何被集体构建的。记者是追求真理的中间人，需要克服对新闻事件单一呈现的局限，通过对事件的深度解读和全面阐释，将报道简单现实转化为报道普遍的“体验”和可被共享的知识。

记者的两个独特身份是“客观中立的报道者”和“参与者”，这样的视角在他们与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发生互动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前者的中立报道者指的是媒体作为信息的提供者，事件的解读者和政府工具的角色（媒体视自身为‘传播的频道或镜子’）；而后者指的是传统的“第四势力”的概念，即将媒体看作公众的代表，政府的批评者，监督宣传政策本身和政策的制定者（McQuail 2000，p.253）。大多数记者将自己视为事件的中立解读者（Weaver 和 Wilhoit，1996），这个立场揭示了客观性是新闻业最为重要的职业准则。要作出新闻判断，需要采集信息，展示事件和呈现问题，新闻工作者会受到一整套规范的指引和约束，规定他们应当如何完成这项重要的工作，什么是好是坏，如何操作会得到鼓励以及什么操作应该避免。

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到底什么才是新闻的基本规范？做好这份职业需要遵守什么规则？这些规则又是如何发展变化以及它们如何与外部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新闻规范的权力从何而来？客观性，准确性，平衡性和公平性（这些作为描述新闻规范的常用术语）这样的原则如何在新闻稿件中具体体现？“行业的实际操作”似乎不仅塑造了新闻场域的结构，而且还创造了其内在的逻辑。在下面的章节当中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即新闻规范到底是如何表达“真相”的，以及这个“真相”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正如新闻发展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发现并说出真相是一项复杂甚至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与众多因素有关，但其中一

个就是特定的一种新闻文化。从现有的比较研究中我们知道，新闻文化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干预’变量（记者，消息来源或公众都可以是变量）以及某种既定的“客观”情境（比如说媒体事件，组织架构，基础设施和系统文化等元素），公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情境知情或被告知”（Deuze 2002a, 第134页）。因此全球各地对新闻规范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很少有研究来识别这些差异，并讨论这些差异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互动之后所产生的影响。

记者是新闻领域的代理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他们并没有受到国家，组织机构，文化传承或市场的明确“监管”，但同时他们的工作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新闻场域视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其中的价值观和职业理念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新闻场域如何不断地影响内容生产的一系列因素发生角力和互动。舒梅科和里斯（Shoemaker and Reese, 1996）列举出这些力量因素其中的五种：个人的力量，惯性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外部（机构）的力量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在本书的研究当中，我们将重点放在新闻实践以及新闻规范与公众讨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用更具实操性的三部体系理论来展开讨论：第一，新闻场域是被来自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外部因素）来定义的；第二是媒体机构（内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第三，来自新闻职业规范的力量（即规范因素）。

这些因素隐含在记者描述自身职业时所用的比喻中，例如“窗口”，“镜子”或“论坛”等（McQuail 2000, 第66页）。记者可能会否认自己受制于“外部”或“内部”的力量或因素，而只是宣称他们受到“规范因素”的驱动，以此实现自己高水准的职业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究竟是什么？哈林（Hallin, 1986）说过，记者所谓的自治感知是一种建立在认为新闻判断可以保持政治中立的错误意识。因此，“这种感知不仅仅是一个谎言或幻觉，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体系，这种体系

对新闻组织的架构和日常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Hallin 1986, p.23）。

新闻职业的兴起使得记者在一个领域可以宣称自己的权威地位，而这个领域其实主要是他们与本专业人士交流的地方。尽管记者和媒体机构权威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整体的发展趋势是记者自主权的不断提升。学者们一边警告说，走向自主的路径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场域有时可能会赢得比其他场域多一些的自治，但也可能很快失去，或者在某方面取得暂时的优势，而同时在其它领域遭受损失”（Hallin 2005, 第229页），学者们也同时逐渐将讨论的范围拓展到媒体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及其建构公众论坛的能力。

《包容性新闻》手册将新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研究，寻求重新考虑新闻的专业规范和价值观建设。旨在希望新闻专业的学生以新的方式来理解新闻究竟如何影响当代生活的潮流和发展趋势。本手册把新闻业看做是一个随时准备调整和转变自己的机构。弹性化的理念很适合提升人们对多样性议题的认知。公民应当如何应对战争，自然灾害，政治分化以及其他类型的破坏和压力，取决于各种资源的可及性以及公民参与决策进程的可能性。新闻记者将是这一进程的核心元素。有关新闻行业的失败实践已有很多论述，而相比之下有关成功的论述不多，但是系统论述新闻行业如何推动建立一个民用，民享和富有韧性的社会，仍然是缺失的。

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出发点首先是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捕捉新闻领域的对话特征，平衡各种论述以及新闻稿件在生产过程中与读者进行持续不间断的对话。这个问题反映了新闻学的本质特征：它扎根于“实证主义”，并声称代表的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但是实践过程中的每个部分，从选择新闻事件到撰写新闻标题都清楚地展示了深嵌新闻生产中的“建构主义”

特征。于是本书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案例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结合起来，这个方案捕捉到了真实现实被社会建构的本质，试图寻找“社会体验到底是如何被创造和赋予特定含义”这一问题的答案（Denzin & Lincoln 2000, p.8）。这个方案借鉴了社会学以及文化和语言研究的解释框架，将新闻实践进行概念化的提炼。这似乎是最为合适的一种策略，可以充分显示意义建构的过程中不成文的规范如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案例通过仔细审查新闻实践的各个核心要素，比如新闻采集方式，新闻来源，框架设定和新闻语言的使用等，来剖析社会现实的媒体呈现这一重要问题。

手册中所采用的方法是批判性话语分析，这是一种常用的新闻研究方法，它超越对文字本身的研究，将语言结构以及语言以外的信息纳入对新闻文本的分析之中。借助一系列已有的关于媒体话语分析的学术研究理论（Fairclough 1995, 1998; Wodak 1997），我们将新闻稿件看作是“将其它事件重新概念化”之后的传播事件广义链条上的单一传播事件（Fairclough 1995, p.41）。批判性话语分析“不仅仅是关注语言本身”（Cook 在 Garrett & Bell 1998, 第 3 页中引用），它还是一种识别传播情境的重要方法。批判性话语分析将话语，即言论和写作中的语言使用，视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

将话语描述为一种社会实践，意味着一个特定的话语事件与构成该事件的情境，机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话语事件既塑造情境又受其影响。也就是说，话语既具有社会构成属性又具有社会条件属性，它既构成了社会情境，知识的对象以及社会身份，还构成了人与人、人群之间复杂的关系。（Wodak 1997, 第 173 页）

话语分析可以阐明新闻专业意识形态与公共领域中声音多样性之间的联系。新闻文字被看作是一种传播性事件，是新闻实践的一种形式，它位于“社会实践的领域内，并与塑造和改变这些领域的社会文化力量和发展过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Fairclough 1998, 第 143 页）。





## 第四章 X 宗教

报道宗教议题很容易出问题。在西方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刊印某人的歧视性言论要承担冒犯他人甚至犯罪的风险；报道宗教不容忍行为需要承担对某宗教团体污名化的风险。在中国，与宗教报道相关的学术研究大都侧重于媒体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政策宣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总体来看，中国各地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例如，新疆和宁夏地区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而青海，内蒙古和西藏地区主要信仰藏传佛教。但其实，在这些地区也同样存在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群。中国学者倾向于将研究放在媒体内部的议程设置上，依照主题，内容和框架分析一段时间内全国或地区性宗教政策相关的新闻报道。此类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鼓励媒体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和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宣传观（Pan & Yuan, 2015）。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现有的研究都集中在报纸对宗教议题的报道上，对其他媒体形式的研究相对不足。

真实，独立，准确，公平，平衡，尊重隐私，致力于减少对他人伤害，是全世界新闻行业所奉行的核心价值观，但现实世界中，无论是新闻编辑部内部还是不同媒体之间，从业人员的美好愿望和日常实践往往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别。新闻职业伦理准则要求记者在工作中要充分意识到媒体报道可能会放大和加剧基于宗教、民族和社会出身差异而产生的各种高歧视。与此同时，涉及宗教题材的报道比较复杂，很有挑战性，需要记者具备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洞察以及充分的社会责任感，从而避免煽动紧张局势，刺激对抗和引发不容忍的行为（George 2014, p.76）。

新闻生产环节众多，从确立主题，寻找信息源，到背景调查，选择合适的报道角度呈现故事的来龙去脉，都会对报道工作提出挑战。媒体对宗教的劣质报道通常包括将个人或群体‘标签化’，选择性使用数据，个别事件一概而论，刻板地负面刻画特定人群，片面讲述故事，使用贬义性语言，混淆事实和观点，缺乏事实核查，并且将新闻标题，图片和声音错误搭配（Rupar 2012）。那么，一篇好的报道该是怎样的呢？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实践建立在深入报道的基础之上，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解释相关法律背景，充分考虑可能产生的影响，让弱势群体得以发声，对受访者表示足够的尊重，提升社会对多样性的认知，避免刻板观念，明确反对歧视，超越事件本身的局限，将伤害最小化。RNS（美国的一个宗教新闻网）获得新闻报道大奖的作品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就是很优秀的范例。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报道将有紧张冲突的地方视为一个调查空间，既包括客观事实，也包括人文关怀和对权势的监督，最终目的是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好的宗教报道应该是建立人类普世价值观和道德理性的基础之上，既植根于所处的背景又旨在有所超越。当前对新闻媒体的不信任以及虚假新闻的轻易传播都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新闻行业自我标榜的“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一简单信条是否还足以应对时代的挑战？在宗教议题的报道上，新闻实践的道德操守令人质疑，不仅没有促进社会的相互包容和同情之心，反而给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处处散布恐惧和紧张的气氛。

## > 案例分析 为新闻故事提供语境和背景

<https://gulfnnews.com/world/asia/india/if-we-kill-you-nothing-will-happen-how-delhis-police-turned-against-muslims-1.1584001614621>

自 2019 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政府颁布新的公民法以来，印度的内乱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一直占据着全球新闻议程的主导地位。下面这篇文章当中，作者试图为近期发生在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冲突提供必要的语境和背景信息。

“

即使我们杀了你，  
什么都不会发生。”

德里警方如何转头对付穆斯林教徒

纽约时报，2020 年 3 月 12 日

撰文：杰弗里·盖特曼 (Jeffrey Gettleman)

萨米尔·亚西 (Sameer Yasir)

苏哈西尼·拉吉 (Suhasini Raj)

哈里·库马尔 (Hari Kumar)

这是优秀开篇的范例。作者以个人的故事切入，好比是以特写镜头开始，然后逐步拉开逐步展现更广阔的问题及其背景。

‘很多人看来’这个说法在新闻报道中很常见，但是需要更加精准。‘很多人’指的是谁？是莫迪的政治对手，人权组织还是国际监察员？

需要注明这个说法的相关出处，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说法可以增加其真实性。

此处列举一些主要的政策会很有用。

此处是个很好的承上启下的例子，用‘更多的证据’引出下面的视频录像存在的事实。

‘一些研究人员’这个说法过于模糊，最好是使用研究者的真实姓名或者注明他们所属的机构。

需要标注信息的出处。

这是一个使用数据诠释社会问题的很好的例子

这个说法出自谁？如果是记者本人，那么需要证据的支撑，如果不是，则需要提供信息的出处。

‘观察人士’一词经常用于新闻报道当中，但其概念非常模糊。具体指的是媒体观察员，还是时政观察员，还是人权活动人士？

新德里：考沙尔 阿里 (Kaushar Ali)，一个房屋油漆工，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街头。

印度教和穆斯林教徒相互投掷石块，封堵了阿里回家见到自己孩子的必经街道。阿里本人是穆斯林，据他说他向一些警察求救，没想到却酿成大错。

根据他的描述，警察将他推倒在地，他的头磕到地上。警察开始殴打他和其他的几个穆斯林。那些人躺在地上，伤口流着血，不断求饶。其中一位两天后死于内伤。那些警察嘲笑他们，不断用手中的棍子猛戳他们的身体，还逼迫他们唱印度的国歌。这些发生在 2 月 24 日的虐待行为都被录像记录下来。

目前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

印度经历了多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宗派流血冲突，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纳伦德拉莫迪政府统治下大行其道的印度教极端主义的必然结果。莫迪政府倡导印度教民族主义中的好战特征，领导人公开妖魔化印度的穆斯林教徒。近几个月以来，莫迪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被广泛视为反穆斯林的政策，比如废除了印度唯一一个以穆斯林为多数人口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

现在更多的证据显示德里的警察队伍在莫迪政府的直接指挥下，很少拥有穆斯林警员，他们齐心协力转头对付穆斯林，二月下旬在首都新德里积极支持横行霸道的印度教暴徒，以穆斯林家庭为攻击目标，烧毁他们的房屋和家园。

好几个视频都显示警察殴打穆斯林抗议者，向他们投掷石块，并不断挥手示意印度教暴徒加入他们。

一名警察指挥官说，暴力事件爆发的时候，当时主要是印度教暴徒发起的，受影响地区的警察奉命将枪支存放在警所。当时《纽约时报》的几名记者听到几个警察之间大声喊叫说他们手里只有棍棒，需要枪支来对抗不断增长的暴徒。一些研究人员指责警察故意造成街头警力火力不足的局面。暴力行为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为针对穆斯林的杀戮行动。

53 名被杀害的人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穆斯林。人权活动家称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屠杀行动。

印度的穆斯林人口仅为 14%，新德里的穆斯林人口为 13%，但穆斯林在德里警察队伍中的占比不足 2%。

印度的警察文化一向以残忍，偏颇，反少数族裔和带有殖民特征而闻名。英国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传统通常认为警察根本不去幻想为公众服务，而是用来镇压不听话的人群的。

但观察人士认为，眼下似乎有所不同的是，莫迪政府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 (Bharatiya Janata Party) 已将印度的执法机器深度政治化。

在莫迪党派控制的州警察对执警目标选择性很强，比如卡纳塔克邦的一名穆斯林学校的校长被关押两周以上，罪名是煽动她的学生参与一部关于新移民法的戏剧演出，警察认为该剧对莫迪持批评态度。

还有一些法官似乎也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风潮的影响或者排挤。

德里的一名法官因为批评德里的警察迟迟不对近期在德里煽动暴力事件的莫迪党成员展开调查，已被调离此案并被调任到另外一个州。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作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政府的裁决，一位名叫阿伦·米什拉的法官（Arun Mishra）竟然公开称赞莫迪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天才”。

所有这一切都不断地给街头的印度教极端分子壮胆。

2月底首都德里东北部宗教混杂且极为拥挤的街区暴力冲突已有所平息，但是一些印度教政客仍然继续引领所谓的和平游行，他们用白色医用胶带包裹他们的头部，制造印度教徒是这些暴力冲突受害者的假象，试图以此颠覆叙事，继续为反穆斯林的仇恨情绪火上浇油。

一些穆斯林对警察完全失去信心，选择离开他们的家园。一千多人涌入了一个在德里郊区新出现的专供国内流离失所者聚集的营地。

在穆斯林领导人眼中，这些暴力行动是政府许可的，目的在于教训穆斯林教徒。多年以来穆斯林对印度教徒私刑残杀穆斯林而免于惩罚的局面保持沉默，莫迪政府不断地削弱穆斯林的政治权力，印度的穆斯林终于从沉默中觉醒，12月与许多其他印度人一起涌上街头，抗议新的移民法。该移民法明显倾斜于接纳除穆斯林之外的南亚每一个主流宗教的移民。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应对目前这种疯狂局面。”穆斯林活动家乌马尔·哈立德（Umar Khalid）说，“政府希望看到整个穆斯林群体屈膝臣服，为他们的生存和生计乞讨。”

“你可以在他们的教义上读到这样的主张”，哈立德指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基本教义，“他们认为印度的穆斯林应当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

流血事件爆发以来，莫迪除了发几条无关痛痒敦促和平的推特之外几乎很少公开表态。德里警方官员矢口否认对穆斯林存有偏见，表示他们“迅速的采取了行动维持法律和秩序”，而当地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不承认他们说的事实。警方发言人兰达瓦（Randhawa）在给各方提问的官方书面回应中表示警察“没有依据宗教立场或其它因素对任何人有任何偏袒行为。”

警察说阿里和其他穆斯林男子受到了示威抗议者的伤害，警察施救，尽管录像清楚显示他们是遭到警察殴打。警察还说，一名警官被杀害还有八十余人受伤；而录像显示的是大群穆斯林抗议者攻击人数不多的警察。

专家们说，新德里的暴力事件符合一种模式，即政府通常先任由混乱持续数天，少数族裔遭到杀害，然后再介入掌控局势。

1984年，在通常标榜代表少数族裔利益的国会党的领导下，新德里的警察好几天都按兵不动，任由暴民屠杀了3000名锡克教徒。

1993年，又是在国会党政府的领导下，骚乱席卷孟买，数百名穆斯林被杀害。

2002年，在莫迪担任国家总理期间，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印度教暴民屠杀了数百名穆斯林。莫迪被指控犯有同谋罪，尽管后来被法庭判为无罪。

如果此处能够提供法官的姓名会更具权威性。如果不可能指名道姓的话，就应该注明‘该法官要求匿名’，这样可以记者的新闻采集程序更加透明规范。

回到报道开头第一段中提到的人物是在长篇幅报道中保持强劲叙事线的一种很好的做法。

几位退休的印度警方指挥官说平息社区暴乱的基本原则就是部署最大可能的警力，大量实施拘捕，但是在德里这两种手段都未被采用。

前任专员阿贾拉吉沙尔曼 (Ajai Raj Sharma) 称这种行为“无法解释”。

他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2月23日暴力事件开始时 - 印度教徒们聚集在一起，在其居住的街区附近强行驱逐穆斯林和平抗议活动 - 冲突双方都有责任。当天快结束时，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遭到攻击，数十人被枪杀，显然使用的枪支是小口径自制枪支。

但是到了2月25日，风向已变。印度教暴徒拓展范围并开始瞄准穆斯林家庭。暴力的气息在空中蔓延。

警察亲眼目睹印度教暴徒额头上画有番红花的条纹，手提棒球棍和生锈的铁棍在街头四处搜寻穆斯林进行杀戮。天空中弥漫着烟雾，穆斯林的房屋，商店和清真寺都葬身火海。

当天《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试图与站在警察附近的居民交谈，一群红了眼的暴徒包围着记者，从他的手中抢走他的笔记本。记者向警察求助时，其中一个警察说：“我帮不了你。这些年轻人躁动不安，一点就着。”

印度内政部掌控德里的警察，由印度人民党最具战斗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之一的阿米特·沙阿 (Amit Shah) 领导，内政部由于治安失败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德里警方官员否认中央政府授意警方对肇事者从轻处理。内政部没有对记者多次提出的采访诉求做出任何回应。

还有就是警察的组成。根据英联邦人权倡议 2017 年所做的分析，大约有 80,000 的德里警察队伍只有不到 2,000 名的穆斯林警员，只有少数穆斯林指挥官。德里警察官员并没有否认这一点，穆斯林领导人说，印度全国的警察行为都是带有偏见的。

印度前国会议员沙希德·西德基 (Shahid Siddiqui) 说：“印度警察带有极端殖民主义和种姓制度特征。”他说，警察的行为总是“对弱者更具暴力和侵略性”。

印度人口约 80% 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团伙正在威胁德里几个街区的穆斯林，让他们最好在本周印度教胡里节假期之前离开。

几天前，一位自称名为“婴儿”的穆斯林妇女开门时发现五十个男人站在门外，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穆斯林的住址。她匆匆收拾行装，可能很快就会离开。

这是作者第二次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通常记者不在新闻现场的情况下，只能依赖先前的媒体报道或者他人的报道来展示信息，也会通过引用著名媒体的报道增加该报道的可信度

在此专门提到记者努力试图向官方信息源求证，这点非常重要。

再次回到先前文中提到的警察构成比例失调的问题。

获得并使用个性化的故事使结尾更有张力和效果，

### 要求学生上课时准备有关宗教题材的新闻报道案例，并提前准备回答以下问题：

- 新闻稿的体裁 / 类型为何重要？请举例论证你的论点。
- 所选案例中的信息来源是什么？
- 新闻文本的结构如何有助于其意义的创造？
- 根据这篇文章，宗教冲突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杀了你，什么都不会发生。”德里的警察如何转头对付穆斯林“？
- 你的举例当中，导致宗教紧张局势的原因有哪些？
- 本文作者是如何设定宗教冲突的报道框架的？
- 通常使用哪些工具来识别宗教团体？

### 要求学生就以下的宗教议题报道指导原则展开讨论：

- 了解国内和国际反歧视的相关立法
- 使用广泛的专家网络作为信息来源
- 提供背景信息
- 将事实放在上下文的语境中
- 调查来自公共信息源的相关文件
- 采访懂行的人，即在该领域有丰富知识的人
- 报道中的人物应当首先作为人来描述，而不是宗教团体的代表
- 避免使用负面标签
- 将事实部分与观点分开，但将观点视为相关内容予以重视

给学生提供一个学术文章推荐阅读书单，并要求学生用一个新闻报道做为案例分析撰写一篇关于宗教议题的媒体报道的短篇学术论文（如果论文是基于比较和对比不同实例，也可以使用两个案例）。

## 报道宗教议题的技巧提示：

- 了解国内国际反歧视的相关立法
- 清楚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流宗教是什么，还有哪些其他的宗教
- 注意对其他非主流宗教人群的刻画
- 公正平衡地呈现一个地区的主流宗教和其他宗教
- 交待宗教冲突和与宗教相关事件的语境和背景
- 将人们先从人的角度描述，而不是宗教团体的代表
- 避免（受）预设（影响），不要抱有刻板印象和对某个宗教的固有偏见
- 将事实与观点分开，但将观点视为相关内容予以重视

## 推荐阅读：

- Stolow, J. (2005). Religion and/as Medi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2(4), 119-145.
- Yao, Q., Stout, D. A., & Liu, Z. (2011). China's official media portrayal of religion (1996–2005): policy change in a Desecularizing Society. *Journal of Media and Religion*, 10(1), 39-50.
- Travagnin, S. (Ed.). (2016). *Religion and media in China: Insights and case studies from the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Taylor & Francis.
- Rugar, V. (2012). *Getting the facts right: Reporting ethnicity and religion*. Brussel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Available [here](#)

## 第五章 X 民族

29

历史上有关民主社会中媒体角色的讨论通常围绕着一个问题，即媒体实践对于人类社会如何和睦相处究竟意味着什么（Couldry 2012）。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的进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不管人们源自哪个民族，围绕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媒体如何才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凝聚力，这一理念已经深深嵌入到任何以政治和社会福祉为目的的信息传播当中。

现实的世界充满了多样性和不平等的特征，对话式民主的终极目标可能很难达成“共识”，退而求其次只能尽力提供一个让“多种声音”表达的空间，能够被倾听（Dobson 2014, 130）。新闻媒体的角色之一就是处理、分发和接收社会信息，从而确保它在提供公共讨论平台和帮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中占据核心的位置。就平等性和多样性的公民价值而言，包容所有不同的人群本来就是媒体平时应该做的，而不仅仅只是在选举的重要时刻。“我们可以既平等又各美其美地和平共处吗？”阿兰·图兰（Alain Touraine, 1998, 140）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发问，他试图挑战以原有的传统方式来处理包容与排斥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中华民族官方定义为中国承认的 56 个民族的总称。汉族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民族（占人口的 90% 以上），与其他 55 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民族区域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并实行民族自治的行政地区。根据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国的民族区域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

关于种族问题的大多数学术研究都集中在外国和中国通讯社如何构建中国少数民族形象的手段上。研究表明外国媒体（例如《纽约时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报道多为负面，诸如意识形态，文化差异和西方价值观等多种因素都会对报道产生影响（刘，2013；丁，2012）。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对少数民族的形象刻画与主流话语体系保持一致，将中国描述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准确地说，对少数民族媒体报道的研究表明，中国媒体笔下的少数民族是接受者，拥护者，生活

得到改善者，政府代言人，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的维护者，重大国家活动的参与者，民族主义者，家乡建设者，具有道德感的公民或民族分裂分子（高，2015；秦，2010；同潘，2012；张，2013 年；李，2019 年）。

中国媒体描绘的少数民族的典型刻板形象是一群生活在乡村，能歌善舞，天天有节日，相对落后，文化程度不高，愚昧无知和贫穷落后的形象（Shan, 2006 年；仇，2013；罗，2012）。学者们指出，少数民族媒体形象塑造很难摆脱主流话语体系的影响（高，2015）。分析有关少数民族的新闻，报道框架通常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56 个民族平等团结，中国文化丰富多元，公民社会和谐发展；对少数民族的报道很容易看出个体品质和集体繁荣并驾齐驱的框架。

致力于多元表达对理解新闻业在社会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媒体承诺要为公众提供准确，公平和不偏不倚的报道，并促进公众参与民主进程。报道时参考不同民族的观点是媒体信仰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和行动的标志。多元化的表达还显示一定程度的特殊性，即在每天的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记者公开认可“多元主题”的理念（2006 年，Day），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议题，值得反复强调多元理念。新闻媒体的干预介入，新闻源的选择公开透明，参考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以及慎重选择报道题目都被视为政治“媒介化”广义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Cushion and Thomas 2013）。

民族多样性已成为当今媒体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报道民族议题使记者有机会为受众呈现社会现实，并且评估，塑造和放大某些社会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一方面，媒体对宗教和种族的报道可以强化已有的社会关系和既存现状，继续巩固刻板认知和偏见的存在。另一方面，记者也要充分意识到媒体报道可能导致歧视进一步加深的危险，而尽最大努力避免成为歧视的帮凶，因为新闻记者应当恪守 1954 年国际记者联盟颁布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中的理想和原则。

## > 案例分析 有序安排事实

[http://zqb.cyol.com/html/2014-08/07/nw.D110000zgqnb\\_20140807\\_1-04.htm](http://zqb.cyol.com/html/2014-08/07/nw.D110000zgqnb_20140807_1-04.htm)

1960年代的劳务移民和1970年代以来的政治难民浪潮使得穆斯林成为德国社会明显可见的族裔群体。根据柏林勃兰登堡州统计局的数据，穆斯林占德国总人口的11.6%。这篇新闻报道聚焦穆斯林与德国主流社会族裔之间的种族、社会、文化和宗教冲突。文中事实的陈述准确可信，副标题的使用加强了文章逻辑的清晰性，技巧娴熟，行文流畅。



### 一篇文章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 穆斯林移民话题再次 搅动德国社会

中国青年报  
2014年8月7日



2012年8月18日，德国柏林的穆斯林民众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稍早前反穆斯林民众在柏林数个清真寺外举行的反穆斯林游行示威活动。CFP 供图（资料图片）



文章中第一次提到的媒体和新闻机构通常应使用全称。

摘要总结故事的核心人物和地点。直接引用原文保证了凡斯特观点的准确表述。

为什么记者对这个政客的土耳其裔背景着重强调？文中提及的其他政客为什么没有介绍他们的族裔？

非常好地选择了多位政客和媒体名人的观点，但是如果能够直接引用原文会更合适。

给出争议另一方的观点总是有用的。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副主编尼古拉斯·凡斯特(N. Fest)，7月26日在其评论文章《伊斯兰教是融合障碍》中，表达了他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他说：“我是一个对宗教友好的无神论者。我不信上帝（神），但我也并不反感基督教、犹太教或佛教。唯独，伊斯兰教让我越来越反感。我反感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青少年犯罪率超出平均水平，我反感伊斯兰教对女性和同性恋那种致命的歧视，我还反感其强制婚姻、荣誉谋杀。”作者自问自答：“宗教是社会融合的障碍吗？我认为，不总是；但具体到伊斯兰教，确实是。这一点，我们应该在吸收移民和难民时加以考虑。”

这篇评论的发表，在德国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德国绿党政客穆特鲁（土耳其裔）认为，该评论是“纯粹的种族主义”。社会民主党政客韦斯特法尔说，这篇评论是“一派胡言”。另一位绿党政客贝克要求报社“向所有的穆斯林道歉”。媒体名人尼格迈耶则要求报社解雇凡斯特。《图片报》主编迪克曼在推特上表示，凡斯特的评论是错误的，不应对穆斯林作出总体性的否定。《星期日图片报》主编霍恩则回应并解释道：“我们并不敌对伊斯兰教。我为让公众产生这样的印象道歉。”

与以上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不少德国读者在网上评论中则匿名力挺凡斯特，认为他说出了多数德国人想说的话，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还有读者表示，言论自由应该包括对伊斯兰教的批评，不能一批评就说是歧视伊斯兰教。

清晰的开场主题句引出这则新闻报道的第一部分。

直接引用原文可以保证准确性，并避免对他们观点的失实表述。

记者在此对信息源的选择和编排方式是否有意引导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的相互对立？社交媒体上可能也会有支持凡斯特观点的评论（这里未做任何展示）。

如果记者能引用一些网上的评论原文而不是总结大意，可能效果会更真实和更具说服力。与上段多位公众人物的原文引用相比，这里的简要总结显得分量不足。

批评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但哪一方更能代表民意？德国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的看法究竟如何？

德国目前有 400 万左右的穆斯林，其中 250 万来自土耳其。绝大多数穆斯林生活在原西德地区。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的增多，他们与信仰基督教以及世俗化的德国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一再引发公众的关注。

1999 年，穆斯林女性戴头巾曾引发争议和诉讼。当年，穆斯林女教师菲若丝塔·鲁婷申请纳入公务员教师系列，被巴符州政府拒绝，因为她拒绝在上课期间摘掉头巾。政府的理由是：头巾不只是个宗教符号，还是政治符号，这与公立学校的中立性和世俗性相悖。鲁婷将政府告上法庭，开始了一连串的法律诉讼。直到 2003 年，联邦宪法法院判定：只要联邦州制定了相应法律，禁止教师戴头巾便属合法。随后各州陆续制定相应法律，迄今德国已经有 8 个联邦州立法禁止公立学校的教师戴头巾。但直到今天，有关“头巾禁令”的争议还在继续。在许多德国人眼里，戴头巾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和限制，虽然很多穆斯林女性表示戴头巾出于自愿，但批评者认为，这是外部压力内化的结果。

伊斯兰教的其他着装规定，也不断刺激德国社会的神经。2011 年，德国黑森州政府禁止一名穆斯林雇员穿罩袍来上班。《焦点》杂志随后的调查表明，75% 的受访者反对在政府工作的穆斯林穿罩袍上班。2013 年，联邦行政法院判定一位 13 岁的穆斯林女中学生不能以宗教为由拒绝参加学校的游泳课，因为她可以穿全身式泳衣，但该学生及其来自摩洛哥的父母认为，半裸的男生和女生同时游泳，有悖伊斯兰教的着装规定。

2009 年，出现清真寺“象征性符号挑衅”言论。当年 11 月，瑞士举行全民公投，57% 的投票者反对该国清真寺修建宣礼塔。《明镜》周刊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德国 44% 的人也会赞同禁止修建宣礼塔。德国目前有七八百座清真寺，随着清真寺的增加，近年来德国针对清真寺的破坏案件（如放猪头、涂鸦、夜间放火）也呈增长态势，这反映出德国人对清真寺的抵触情绪在增加。德国右翼政党 Pro NRW 的秘书长维纳尔甚至将穆斯林在德国修建清真寺视为一种挑衅：“我们将修建清真寺视为穆斯林征服德国的一种进攻性的权力宣示符号。”

2005 年，强制婚姻与“荣誉谋杀”案件震惊德国。当年 2 月 7 日，年仅 23 岁的哈彤·苏鲁促使其兄弟枪杀在柏林的一处公交站台。她出生于德国柏林，父母是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人。16 岁时，她被父亲勒令退学，并被迫嫁给一个远在土耳其的表兄。因为与丈夫及其虔诚信教的家庭不和，她独自离家回到柏林，尝试开始新的生活，并摘下头巾。她的 3 个兄弟认为她违背了伊斯兰教传统，令家庭蒙羞，于是合力将其杀死。这起案件引发了德国有关穆斯林价值观、强制婚姻和荣誉谋杀的大讨论。在柏林一所中学的课

■ 第一句话总结了上一部分的内容。紧接着的问题开启了第二部分的内容。

■ 需要标注信息的来源。

■ 清晰流畅的一系列举例（穆斯林头巾，服装，宣礼塔的修建以及谋杀案等）来解释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从象征性冲突到实际发生的暴力冲突）

■ 需要对‘象征性符号挑衅’做进一步的解释。

■ 需要解释为宣礼塔是什么，因为中国读者不太熟悉这个概念。还要解释为什么德国人反对修建宣礼塔？

需要标注信息的来源。

堂讨论中，3名土耳其裔学生对这一谋杀事件表示支持和赞许，称“这只能怪苏鲁促自己，这个婊子搞得自己像德国人一样”。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再度轰动全国。200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期间，德国数个城市都爆发了抗议“荣誉谋杀”的示威活动。但直到今天，“荣誉谋杀”案件在德国仍然层出不穷，在过去5年中，仅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此类案件就有114起。

问题的正反面都提到了，但是报道份量很不均衡。

穆斯林青少年犯罪和社会融入问题让人忧心。2010年5月，德国联邦内政部委托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德国生活的穆斯林中，有25%的人具有对其他宗教信仰者采取暴力的倾向。同年，联邦内政部和下萨克森州犯罪学研究所（KFN）公布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在德国的移民中，穆斯林青少年比信仰其他宗教的青少年更具暴力倾向。而且，越是虔诚的教徒，暴力倾向越突出。德国有媒体在报道时选用的标题非常醒目且耸人听闻：“穆斯林青少年：越虔诚，越暴力”，赚足了公众的关注。不过也有分析者指出，研究只是发现了相关关系，并不能作出信仰伊斯兰教会导致犯罪的因果推断。

犯罪学研究所在2007-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了宗教信仰对青少年移民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该项调查显示，不信仰宗教的青少年移民在德国社会的融入度最好；穆斯林青少年的社会融入问题，被视为其犯罪率偏高的原因之一。

通过清晰的提问方式进入这篇报道的第三部分。

多达400万的穆斯林人群，已经成为德国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穿长袍、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在德国大街上随处可见。但是，他们已经被德国主流社会接受了吗？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德国的一部分了吗？

提供的有关伍尔夫的信息完整而准确。

2012年因涉嫌受贿而辞职（今年初汉诺威法庭判决对他的受贿指控不成立）的德国前总统伍尔夫，曾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最近在德国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表示，《图片报》和《明镜》周刊等媒体之所以执意把他逼下台，并非是因为受贿，而是因为他曾公开表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导致很多人看他看不顺眼。伍尔夫的说法无疑具有浓重的阴谋论色彩，但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他说“伊斯兰教是德国的一部分”缺乏民意支持。

这是记者的评论，需要证据的支持。

德国融合与移民基金会今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53.2%的德国人认为，伊斯兰教不是德国的一部分；63.1%的德国人不同意穆斯林教师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75.9%的德国人不赞同穆斯林学生以宗教为由拒绝上游泳课或其他体育课。德国电视1台2009年12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5%的德国人对伊斯兰教的扩散感到忧心；82%的人认为清真寺对其构成了干扰，宣礼塔给人一种支配性的压迫感。

需要标注信息的来源。

这说明，德国人还没有接受伊斯兰教。这并不奇怪，德国毕竟是个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在8200万居民中，有2520万人信奉天主教，2450万人信仰新教。头巾禁令、对清真寺宣礼塔的抵制，都可被视作基督教文化对伊斯兰教文化的抵制和排斥。

莱比锡大学教授布莱勒指出，对穆斯林的反感情绪，已经蔓延至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希望本国禁止穆斯林移民。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的联邦议员诺尔波特·盖斯表示，在三四十年之后，德国每两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是穆斯林。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在德国，确实有不少人对穆斯林人口的快速增长感到担心。德国电视 2 台不久前报道了英国学校被伊斯兰化的问题——在伯明翰的有些城区，穆斯林人口已经超过 70%；在当地的 21 所小学里，阿拉伯语已成为必修课，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基督教节日不再被庆祝，男女生要分开坐甚至分开上课，班级旅行目的地是圣地麦加，学校要传授《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价值观。这，可能正是不少德国人担心看到的未来景象。

受纳粹历史的负罪感、挥之不去的排外形象和“政治正确”教条的约束，德国公众人物大多不敢公开表达对外来族群的批评，因此，对凡斯特的批评言论未必真能代表民意，甚至未必发自批评者自己的内心。虽然凡斯特的评论失之主观化和绝对化，但若能引发有关穆斯林移民融合问题的讨论，倒也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社会的融入问题，涉及穆斯林少数群体如何在一个非伊斯兰教国家与主流社会共同生活的问题。这不仅是德国关心的问题，也是欧洲及世界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

这里的意思是说有些人担心伊斯兰教在德国的快速增长，但是下面的数据只是证明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这是谁的观点？如果是记者本人，请提供证据支撑，如果不是，请提供信息来源。

这样的解读需要证据的支持。

最后一段立意不错，但性质上属于编辑声明，而不是基于客观报道事实而得出的结论。

## > 辅导提纲

### 思考题：

- 这则新闻稿件中引用了多少来自不同出处信息？
- 稿件的结构如何帮助构建作者想表达的含义？
- 作者是否保持了新闻记者应有的客观立场，如何做的？
- 是什么导致了德国的种族冲突？
- 作者使用什么样的框架来报道德国的宗教冲突？
- 文中是如何刻画穆斯林群体的？

### 报道种族问题的技巧提示：

- 使用广泛的专家网络作为信心来源
- 提供背景信息
- 清楚了解该国家或地区的主流种族群体是什么，其他还有哪些种族？
- 应该倾听少数族群的声音
- 注意种族刻画时，- 避免（受影响）预设，不要对种族群体加负面标签，持刻板印象和偏见
- 尽最大可能核查每个事实
- 公正平衡展现不同的种族群体
- 将种族冲突和种族相关事件语境化
- 将人们先从人的角度描绘，而不是族群的代表
- 将事实与观点分开，但将观点视为相关内容予以重视

### 推荐阅读：

- Spencer, S. (2014). Race and ethnicity: Culture,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Routledge.
- Ahmed, S., & Matthes, J. (2017).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Muslims and Islam from 2000 to 2015: A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9(3), 219-244.
- Sun, Z. P. 孙志鹏 (2019) 新型主流媒体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报道框架——基于人民网少数民族报道的分析 (2008—2017) (Minority image in the framework of mainstream network media reports—Analysis of ethnic minorities based on people.com.cn reported). Retrieved from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109/c424554-30513313.html>

## 第六章 X 种族

37

关于种族主义和媒体关系的国际研究表明，“尽管国家，时代和报纸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媒体仍然是造成种族主义存在的因素，而没有提供解决方案”（Van Dijk 2004, p.17）。种族主义一词是指一种信念，即相信不同种族具有不同的特征，能力或特质，尤其是将不同种族之间划分出高低优劣。在传播研究的语境下，种族主义通常用来特指一个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白种人所持有的带有种族歧视的视角，将其他群体边缘化的同时将白人定义为优越者。（Ji, 2020）。正如戈夫曼（Goffman, 1963）所描述的那样，人类社会大体存在三种污名形式，身体的畸形，个性的瑕疵以及种族，民族和宗教的部落污名。尤其是每当疾病传播的危险临近时，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就会蔓延加剧。从 2009 年的 H1N1 流感病毒，2014 年的埃博拉病毒，到 2019 年的 Covid-19 新冠病毒大流行，四处蔓延的不仅是对疾病的恐慌，还伴随着种族歧视。疾病大流行时，污名和歧视也是紧紧相随。疾病的污名化是一个群体在压力之下对社会产生恐惧心理和自我保护的应急反应（Ji, 2020）。比如法国《皮卡尔信使报》（Le Courier Picard）的头版上的醒目标题为“黄色警报”，旁边的配图是一个戴着口罩的中国女性。同一份报纸的另一个新闻标题是“新的黄祸”，指的是武汉冠状病毒爆发。“黄色危险”或“黄色恐惧”带有种族主义的隐喻色彩，用来影射中国人是对西方世界生存的一种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杰西杨 Jessie Yeung 认为，“在一个对发生在中国的死亡和疾病的报道中援引这个词，往好里说是没脑子，往坏里说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他的观点可以从联合国手册《种族主义的维度》中获得验证，手册中强调“种族主义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根据手册中的观点，种族，阶级和性别都可能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会对人们对疾病的认知，人们寻求治疗的方式和获得帮助的路径产生很大的影响（Parodi, 2020）。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进入新闻制作流程的路径很多：新闻编辑间从业人员自身背景缺乏多样性，新闻价值观的具体应用，官方信息的使用，报道主题的等级划分，记者自身的种族偏见，新闻风格和修辞习惯等等。新闻媒体对种族主义在社会中持续存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表明新闻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既与内容生产的大环境有关（人员雇用，晋升，新闻节奏，新闻采集，信息源选择，写作风格等等），也与新闻话语体系本身有着紧密的关联。

学者们记录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即使有所记录，对少数民族的描述也是非常陈旧刻板，而且只是一些边缘角色：“即使不是所有的刻板印象都是负面的，但有些看似善意的描述也可能带着家长式的，伪善实为偏见的口气，这也是有问题的。（Ramasubramanian and Oliver 2007, p.624）。为了分析这样的刻板印象如何被媒体加工之后变得自然和普及的原因，就需要了解‘种族建构’的框架，‘种族建构’指的是‘一个种族被创造，占据，改造和消灭的社会历史过程’（Omi and Winant, 1994, 第 55 页）。这个框架之所以非常有用是因为它指出一个种族是如何被赋予某个特定的含义和标签的，使得人们对该种族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不断被强化（Omi and Winant, 1994, p. 55）。

新闻媒体作为文化生产和信息的来源，为理解人类，社会议题和热点事件提供了解读框架，为世界如何以及为什么如此运转提供了答案。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存在并不是编辑有意识的决定，而是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先入为有的理念和普遍存在的认知，渗透到日复一日的常规报道当中。媒体报道中公然表达种族歧视的话语体系正在消失，但基于种族主义的隐形歧视仍然存在，描述和反映这种社会现象要求新闻从业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能够将具体事件放置于使其产生的宏大社会背景结构中进行深度的剖析和报道。

> 案例分析

## 结构一个好的故事来构建 一个强有力的叙事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jun/06/george-floyd-plight-reflected-burden-of-being-black-america>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去世已成为美国种族歧视的象征。下面的文章通过使用多种新闻报道手段来探讨这个问题：基于个体和群体的抗争经历构建了一个有力的叙事线，基于证据带出论点，探讨了结构性种族歧视的问题以及克服种族主义的路径。

在生与死之间，

乔治·弗洛伊德

# George Floyd

的困境折射出在美国  
生为黑人所承受的重负。

卫报，英国  
2020年6月6日

开篇句清晰地展示了下文的叙事主线，即弗洛伊德的死是美国长期以来系统性种族歧视的象征。

继续描述目前的发展趋势之前，再次强调主体的报道框架。

借用重复表达这种修辞手段使得叙事主线保持高度一致，还同时引导读者期待这句论断之后一定会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这则报道是纪念仪式之后撰写的。记者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通过引用参加纪念仪式的人的叙述和演讲撰写报道，或者通过弗洛伊德这样一个象征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构建自己的叙事线，反映这一事件对美国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和种族边缘化问题的深远影响。

颈部被一个警察用膝盖紧紧压住，头部紧贴水泥地面，乔治·弗洛伊德的面孔（George Floyd）成为现代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族抗议活动之一的象征。美国各电视台和社交媒体反复播放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死在明尼阿波利斯四名警官手中的视频，使得已处危机当中的美国更加危机重重。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美国经济陷入自由落体。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和惨重的失业人数严重影响着美国黑人的生活，4200万失业人数当中黑人占比很高。

美国黑人不仅遭受着连续几代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危害，现在他们死于新冠病毒的机率和疫情所导致的创纪录的失业机率也要远远高于其他种族。

乔治·弗洛伊德生前也不例外。

州医学尸检官本周证实，弗洛伊德4月下旬的时候也染上了新冠病毒，失去了工作。但感染病毒并没有导致他死亡。

相反，正如历史学家卡罗尔·安德森（Carol Anderson）所说，弗洛伊德死于“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种族歧视的惨剧”。

她说，“我们看到的是可怕的种族歧视：一个警察将他的膝盖抵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毫无表情，无视生命。”“此情此景让人们感到焦虑和伤害，而此时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弗洛伊德已感染了病毒，但他的遭遇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

家庭律师本·克鲁普在星期四的追悼会上说，弗洛伊德并没有死于新冠病毒，真正夺去他生命的是“种族主义的流行病”。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去世还象征着黑人在刑事司法体系中举步维艰的痛苦境地，对于许多人来说，弗洛伊德的经历和被杀害的时机凸显了在美国生为黑人所承担的重负，并点燃了本周起义暴动的导火索。

明尼阿波利斯一家餐馆老板兼人权活动家达拉·比瓦斯（Dara Beevas）说：“类似这样的事件注定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和美国各地发生。”她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15年之久。在她看来，黑人社区因被忽视几乎变得无形，使得不平等现象趋于沉默不为人知。

比瓦斯还说到：“当你向人们发出这么多他们的历史，文化和人性都无关紧要的信号时，就一定会遭到他们的拒绝和反抗。”

弗洛伊德的一生是一个听起来耳熟能详的美国黑人的故事，不断跌倒或被生活击倒，然后又重新站起来的故事。虽然他并不完美，但他所在的明尼阿波利斯的同事说他是一个很努力工作的人，他家乡休斯敦的人们也说他是社区生活的主力军和导师。

他因携武器抢劫罪锒铛入狱，2014年出狱后离开家乡德克萨斯州前往明尼苏达州以寻求更好的机会。20世纪以来数百万非裔美国人走的是同样的大迁徙之路，主要是试图逃脱南方的种族主义，到相对自由开放的北部寻求改变命运完成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

但是在明尼苏达州弗洛伊德还是面对着很严重的种族歧视，在这里，黑人居民被警察杀死的机率要高 13 倍以上。

该州的非裔美国人仅占全州人口的 6.8%，主要集中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两座城市。就像人口稠密城市中的许多黑人居住区一样，这也是新冠病例最高的地方。明尼苏达州近 25,000 例确诊病例，其中确诊和死亡人数的 16% 是黑人。

弗洛伊德官方尸检报告中提到的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也是造成美国黑人更容易感染和死于新冠病毒的潜在危险因素，其它高风险因素还包括肥胖和糖尿病。

对于比瓦斯来说，发生在美国黑人身上的多种罪恶人们充耳不闻，直到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道上发出“我无法呼吸”的临终呼叫时这种罪恶才被放大和引起关注。

她说：“通过为弗洛伊德呐喊助威，一个常年被忽视同时也习惯了被过度执警的人群终于站起来反抗，这一讯息传到四面八方。

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揭露了不平等如何加剧了新冠危机对黑人社区的影响。

黑人没有健康医疗保险和生活在医疗资源不足的社区的可能性是普通美国人的两倍。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美国基础产业的产业工人，这些因素都将他们推到流行病危险的最前线。

首席研究员兼高级经济学家埃莉斯·古尔德 (Elise Gould) 表示：“当黑人工人失业时，长期以来的歧视和不平等“可能使反弹和恢复常态变得更加困难。

“相比其他种族，[美国黑人已经]经历了更高的失业率，更大的工资差距，更低的家庭平均收入和更高的贫困比例，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们很难熬过失业风暴的打击。”

弗洛伊德生前工作的餐厅因明尼苏达州的居家抗疫令而关闭时，他成为 44% 失业的非洲裔美国人之一。

像他这样的美国黑人首当其冲感受到经济螺旋震荡的冲击。美联储发现，年收入低于 40,000 美元的家庭中，2 月份就业家庭中有近 40% 3 月份或 4 月初又失去了工作。

这几乎是所有黑人家庭的一半。

作家兼学者卡罗尔·安德森 (Carole Anderson) 辩称，“通常，同时发生的多个全国性危机会引发社会动荡不安”。虽然标题新闻将这些危机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情况，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美国是否会陷入内战废奴主义者的作用至关重要，”安德森指出。“他们通过假装奴隶制在美国并不严重的托词拒绝让美国滑入内战之争。”

此处和文中其它地方有效的数据使用既支撑了主要论点也没有打断叙事的节奏。

作者先提出结构性歧视会产生后果的说法，然后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会如此。

有效使用信息源，引用一个学者的原话说明多次发生的危机实际上都与允许此类危机爆发的一个人紧密相关。■

通过描述她忍住眼泪的细节将情感注入到报道当中，而不是直接告诉读者（她很动情。。。）。■

借用重复表达这种修辞手段使得叙事主线保持高度一致，还同时引导读者期待这句论断之后一定会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尽管如此，她还是承认这次的事件有着不同以往的能量，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弗洛伊德事件“是最令人震惊的现代实例之一，表明（美国）一直以来所标榜的价值观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和矛盾”。

安德森（Anderson）认为这样的变化发生的原因主要归于一个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所领导的这场危机本来是“可预防的，但却是史无前例的”。

她回想起弗洛伊德生命的最后一刻时强忍眼泪，她听到的一个男人绝望的哀嚎，呼唤着他两年前去世的母亲。在她听来，那是一个男人绝望的哭泣声。

而对其他人而言，这是行动的召唤。

自弗洛伊德死后，狄安·史密斯（Dionne Smith-Downs）从加利福尼亚出发，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的许多次抗议活动之一。她在2010年因警察暴力而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因此当弗洛伊德临死前发出的“呼唤母亲”的惨叫时，她本人感同身受。

她接受 Breakthrough 新闻采访时说道：“当他呼喊‘妈妈’时，我知道我必须来。”“我听到了他发自内心的呐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的原因。”

参与逮捕他的四名警察均已被解雇。将膝盖跪抵在弗洛伊德的颈部的那个警察是当过19年兵的戴瑞克肖文（Derek Chauvin），他已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而其他三名警官则因协助教唆杀人也被指控。

美国历史充斥着赎罪和变革的承诺，即使这次在警察杀人之后引发了全世界各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但大多数的历史承诺依然未能实现。

这次抗议活动的影响力超过以往，因为人们越发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不只是黑人的责任。”比瓦斯说，“我们不必再质疑压迫的真实存在。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群一直在发出‘我无法呼吸’的呐喊”。

她说：“美国现在的问题是要倾听这样的呐喊。”弗洛伊德的生命和死亡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因为对于很多人而言，美国黑人的历史就是不断斗争，获得胜利和坚持不懈地成为不平等制度的受害者的故事。

佐治亚州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是最早的‘自由骑士’之一，在民权运动中遭到暴民的殴打，他在NBC周四晚上的‘今日秀’节目中表示，尽管他“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但这次“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他看到一丝希望”。

“我们会到达目的地。我们将实现我们的目标”。他向新一代的正在与历代种族冲突作斗争的领导者们示意，“我们将生存下去，我们将继续前行，没有后路可退。”

## 要求学生识别文章中的事实和观点。 基于以下问题展开讨论：

- 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什么，作者是如何展开讨论的？
- 文中的事实和观点能够区分吗？作者是否试图将两者加以区分？
- 文章是如何结构的？为什么？
- 文章的信息源有哪些？每一个信息源如何有助于故事的叙事？
- 记者使用了哪些文学工具？
- 这则报道中形容词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讨论种族问题被推到政治最前沿的政治时刻。特朗普总统对美国种族紧张局势发挥了什么作用？种族矛盾助推下的政治环境中新闻媒体应该承担什么角色？

## 推荐阅读：

- Spencer, S. (2014). *Race and ethnicity: Culture,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Routledge.
- Downing, J. D., & Husband, C. (2005). *Representing race: Racisms, ethnicity and the media*. Sage.
- Van Dijk, T. A. (2012).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racism. In *Migr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 15-29). Springer, Vienna.



## 第七章 X 地域

45

国际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其他地区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及其走向的认知和理解。各种积极的报道（科学新发现和疫苗的成功研发）和消极的报道（灾难和恐怖主义）都会跨越国界为人所知。通讯社选择报道什么样的国际新闻都会影响国内听众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的理解和认知（Wanta, Golan 和 Lee, 2004 年）。

报道公共卫生事件时，一种“污名化”的常用方法是用地方命名某疾病，从而导致对居住在这个国家，地区和土著社区的居民的歧视。比如说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和西班牙流感这样与疾病相关的污名就会随着新闻报道中每次的提及而加深。通过重新审阅此类污名所产生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颁布《命名人类新型传染病的最佳实践》，呼吁全球科学家，政府卫生部门和全球的媒体机构避免使用地理位置命名疾病，避免对这些国家，地区和居民造成不利影响。因为一旦疾病名称为公众所熟知，就很难更改。但是，即使有了科学的规范和规定，媒体依然可能在报道中不遵守规范。

例如，《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武汉病毒会全球大流行吗？”的文章。文章不仅在标题上方用红色字母注明“中国制造”字眼，而且还使用了一张卡通图片，画的是一个带着红色中国国旗面具的地球。全世界的媒体在世界卫生组织于 2 月 11 日正式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COVID-19”之前，出于一己之便广泛使用“武汉肺炎”一词。在 2 月 11 日之后依然继续采用“武汉肺炎”和“武汉病毒”的说法，分明是故意将疾病政治化，导致对某个种族和疾病来源地的歧视。一些学者认为将地名与疾病相结合是污名化‘他国’最直接最容易的手段（Ji, 2020 年）。

作为守门人，媒体的责任是选择和报道新闻时事，设定报道框架，给公众提供信息（McCombs and Show, 1976）。不同的新闻机构总会选择性地报道国际新闻，并基于地缘因素而决定如何报道，这种做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Schramm, 1959）。长期以来媒体研究一直都在强调南北半球之间的报道不平衡问题，或者说是中心和边缘国家报道不平衡的问题，比如说政治，文化，新闻和信息的不平等流动，信息主要来自北半球（以美国和欧洲之间为核心），流向南半球和边缘地区（Thussu, 2006）。北半球国家拥有资源，关系和支持者，拥有投资和合作伙伴，使得他们能够传播带偏见的，单向的新闻和信息流动。全球的信息媒体系统更倾向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视角，可以让发达富裕的国家受益，损害的却是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多数国家的利益。国际通讯社和电视网络尽管覆盖全球，但却因为总是服务于核心国家（Hafez, 2011）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世界观（Cottle & Rai 2008）而备受诟病和批评。Grasland 等人（2016）提出了地缘议程设置的概念，指的是媒体对国家和地区的报道旨在提高其可见度。对他国公共事务的报道框架可以塑造和影响国内受众的态度。记者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具体问题概括总结，在已然被定义的问题上创建一个可接受的含义范围，并随意解读，加以道德评估并提出应对方案，从而为受众塑造了一种虚构的现实（Entman, 1993）。

## > 案例分析 使用其它媒体的报道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313/china-coronavirus-cost/>

这是一则有关 Covid-19 的新闻报道。文中声称中国可能会赢得这场与病毒的斗争，但可能会付出痛苦的代价。报道中汇集的很多故事都是支持某个具体的观点。记者非常擅长使用设问修辞的方式来引导读者，试图削弱和动摇既定的事实。整体叙事的逻辑旨在吸引读者的眼球。

# 中国也许有效控制了疫情 但代价惨重

该说法属于双重标准，文章的题目使用“也许”一词，表示作者不大愿意承认中国在疫情防控上的有效性。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0年3月13日

开篇说的是全世界的新冠疫情，但是紧接一句却提到了中国。

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中国是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地方而不一定是病毒首次出现的地方。这是在借用疫情抹黑中国。

需要注明具体日期。

这个表述不准确，封城只是在武汉而不是整个湖北省，受影响的武汉居民将近 1000。

这个说法很模糊，谁心存疑虑？需要标注信息源。

这个形容词带有明显贬义色彩，暗指对该策略并不认同。

数据错误，3月12号的时候，美国的新冠病例已经超过一千例：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dpr-consent/?next\\_url=https%3a%2f%2fwww.washingtonpost.com%2fworld%2f2020%2f03%2f11%2fcoronavirus-live-updates%2f](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dpr-consent/?next_url=https%3a%2f%2fwww.washingtonpost.com%2fworld%2f2020%2f03%2f11%2fcoronavirus-live-updates%2f)

北京一随着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肆虐，股市遭受重创，全球旅行中断，数亿学童无法上学，各国政府都在迫切寻求控制病毒的方法。

中国，病毒的始发地，说他们有答案。

出乎一些人意料的是，这个在疫情初期存在瞒报和应对不当的国家，似乎控制住了疫情，至少从官方数据看来如此。最近几天，即使其他国家的新增病例激增，中国的新增感染病例显著下降。世界卫生组织赞扬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

中国官方宣布周六新增确诊 99 例，而这一数据在两三周前约为每天 2000 例。而且，除了疫情中心武汉之外，湖北省其他地区已经连续两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中国称这一趋势证明了其控制手段——包括封锁湖北境内近 6000 万人，并对数亿民众和外国人实施严格隔离和旅行限制——是有效的。它已经开始在国内外的政治宣传中宣扬这些举措取得了成功。

世界其他地方，大多数还正战战兢兢地面对首批感染病例，它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对于中国的数据是否有误、是否完整，大家也心存疑虑。真正的考验在于，当学生返校、工人复工、上班人群重新乘坐公交和地铁时，病毒是否会卷土重来。

中国生硬的防御措施，还对其他国家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是以民众生计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即使对于那些可以重复中国模式的国家来说，也不得不考量，这种治疗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我认为在击溃病毒方面他们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T·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T. Osterholm）说，“但我对其可持续性感到怀疑。中国人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他们是控制住了病毒？还是仅仅压制了它？”

向中国学习的国家需要考虑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被掀了个底朝天。

其他地方，如意大利、韩国和伊朗，正在艰难地遏制病毒传播。美国目前已有超过 400 例确诊病例，而因为试剂盒问题以及放任病毒在西雅图疗养院这样的高危人群中传播，政府饱受批评。当前，疫情已经危及全球经济增长，并正在助长移民和全球化方面的倒车。

最好用学生一词而不是儿童

一些人指的是谁？为什么惊奇？

这个措辞显示对事实表示怀疑

到底几个星期应该具体准确。

‘宣传’一词主要是指有意影响受众，带有主观色彩，暗示可能通过选择性地展示事实来鼓励某种特定的认知和信息合成。

这样的说法需要证据支持。使用‘真正的考验’这样的说法意在否定中国最初面临的困难也是在否定中国应对区域性疫情所取得的成功。

将事实和观点混在一起。

引出下文的怀疑，既否定中国先前所做出的‘令人称美的努力’也否定了客观事实。

如此概括不够准确，需要更加精准。来自哪里的病人？什么时候难以获得及时的护理？

需要有具体的日期。

那么对别的国家呢？数字不是关键，数字背后的每一个生命才是关键。

需要标注具体日期。

向中国学习的国家需要考虑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被掀了个底朝天。

中国的经济几近陷入停顿，众多小企业表示，资金链可能很快无以为继。危重的病人很难及时就医，一些人甚至病故。数亿人曾处于不同形式的隔离中。据官方媒体《中国日报》称，截止周五，北京仍有 82.7 万人被隔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资深学者詹妮弗纳佐 (Jennifer Nuzzo) 博士说：“我一直担心只关注控制病毒的所有关注。”她建议采取更审慎的应对措施，例如香港和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措施。那里的官员颁布了有针对性的隔离措施，但并未完全关闭工作场所，从而使各自的经济体能够继续经营，同时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地遏制了该病毒。

“我们必须更全面地看待社会影响，”努佐博士说，“要仔细计算这些方法的社会成本，而不能仅仅锁定疫情数字。”

对中国来说，数字是关键。

与两个半星期前相比，周六报道的病例数大幅下降，当时中国记录了约 2,000 例新感染病例，每天有 100 例死亡。据报道，周六有 28 例新死亡，全都在湖北。

相比之下，意大利在周五报告了 49 例死亡。

根据官方数字，武汉以外地区的传播已被有效阻止。周六报告的 99 例新增病例中，除了一人之外，其他都在武汉或从境外输入。

世界卫生组织说，中国的控制手段也许让数十万人免受感染。中国的努力显示，病毒的不可控传播“不是一条单行道”，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周四说道。

“这种传染病是可以能够被打败的，”谭德塞博士说，“但只能有赖于整个政府机器集中、协调一致而全面广泛的行动。”

被派往中国的世卫专家还指出，当地医院每天可以通过 CT 扫描和试剂盒确诊数百人，武汉的一些体育馆被用作大型隔离中心，将轻症患者与家人分开。

“毫无疑问，针对这种快速传播的新型呼吸道病原体，中国的大胆举措改变了这场急速升级并仍将是一场致命疫情的走势。”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 (Dr. Bruce Aylward) 上个月在北京告诉记者。

事实？证据？夸大的戏剧性描述。使用‘掀翻’一词暗指采用‘强迫手段’。

这是谁说的？信息来源是什么？如果是记者本人，则需要有数据支撑，如果不是，则需要注明信息来源。

需要标注具体姓名。

数据显示，激进的隔离措施，如果能执行彻底，可以扼制病毒的传播，范德比尔特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的传染病专家威廉·舍夫纳博士 (Dr. William Schaffner) 说。

“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公共卫生实验，”舍夫纳博士说，“他们无法将疫情灭掉，但确实让它受到了控制。而且这一实验也的确为世界其他地区赢得了更多时间。”

需要注明信息的来源。

然而，中国的总感染人数已超过 8 万，这是一个相当骇人的数字。而且我们有理由对官方数据存疑。

解释具体的理由是什么。

在疫情暴发的初期，试剂盒与病床短缺致使很多人做不上检测。很多轻症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在最近几周内，中国政府好几次改变病例统计方法，导致报告数据出现大幅度波动。但专家表示，这样的调整并不罕见。

需要注明专家的名字，领域和所属机构。

医学专家说，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在湖北的医疗机构以外进行了积极的冠状病毒检测。专家说，除非扩大检测范围，否则无法确定疫情的真实程度，因为那些轻度感染者可能不会去看医生。

需要注明专家的名字，领域和所属机构。

香港中文大学何鸿燊防治传染病研究中心 (Stanley Ho Centre for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主任许树昌说：“目前，我们关注到的是冰山一角。”

政治色彩和倾向太强。将客观事实和主观观点混为一谈。观点需要有证据的支持。‘许多人’指的是谁？

执政的共产党将疫情速度放缓歌颂为威权主义及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优越性的一个标志，该制度赋予官员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但它的高压措施正在考验民众的耐心，其中许多人认为，如果官员们没有首先掩盖疫情暴发规模并使吹哨人噤声，那么这种强制措施本可以避免。

这样的陈述需要有事实和数据的支持。

限制的影响在湖北感受最为明显，自 1 月份以来，湖北已实质封锁了 5600 万人。五个多星期以来，随着病毒肆虐社区、许多人家举家遭难、成千上万的医务人员感染，往日繁华的大学、商业和交通枢纽变成了一个个鬼城。

过度戏剧化和煽动性的表述。

中国抗击病毒的经验也凸显出，如果医院床位和检测试剂盒短缺，就会出现家庭感染的风险，就像武汉那样，数周之内，许多生病的人被送回家并感染了亲属。

主观臆测？需要加以澄清。

路障将城市封锁，公共交通停运，私家车大部分禁止上路。在武汉，最近几周加大了对个人行动的限制，现在大多数居民被禁止离家。

社交媒体上的一面之词

在湖北民众当中，有迹象表明，愤怒和沮丧情绪正在加剧。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充斥着居民的帖子，说他们由于封锁太久而失去了工作，难以偿还抵押贷款。还有人则描述了他们所在社区的食物短缺情况。

需要标注具体的日期。

周四出现了对政府的罕见指责，在武汉一个小区，不满的居民在高官走访社区时大声抗议。

哪个居住小区？需要有具体信息

“假的！全是假的！”一位居民向代表团大喊，代表团中包括领导中央政府应对疫情的副总理孙春兰。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随后表示，**这些指控是针对那些向居民运送菜肉时“作假”的当地社区官员。**孙春兰下令立即对此事进行调查。

需要更多的细节。

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周五**宣布要在广大市民中开展感恩教育，此举很快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嘲讽和愤怒。

需要标注具体的日期。

由于被迫长期居住在受限的空间内，家庭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武汉的女权主义者郭晶**（音）说，她和其他志愿者已经接到了许多居民寻求帮助的报告，说她们在家中受到家人的身体虐待。

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在这里使用的很好。如果文中需要使用某种标签，记者应尽力展示该标签的功能和作用。否则就只是一个博眼球的细节而已，无助于加深读者对故事的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疫情期间她们很难求助，”郭晶说。“出家门都很难。”

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被广泛阅读——并经常被删，她说这次封锁对居民造成了心理伤害。

“普通百姓的经济来源无着，也没有确定感，即哪天可以出门，”她在最近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在自己抓摸不着，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会导致最基本的安全感丧失。”

在湖北以外，中国希望刺激经济，但地方官员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减少感染人数不愿承担风险。即使各省下调了对该病毒的响应级别，许多公司还是选择谨慎行事。根据在中国有影响力的杂志《财新》的最新报道，一些地方甚至伪造了用电量，以达到严格的复工目标。

**一些专家**越来越怀疑，随着病毒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中国的封锁是否会变得毫无意义。他们说，鉴于该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以及发现轻症病例的难度，即使在中国也不大可能将其彻底消除。

需要注明专家的姓名。

“我确实认为病例数的下降可能意味着，已采取的所有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措施可能正在产生效果，”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流行病学教授马克·利普西奇 (Marc Lipsitch) 说，“但我不认为零等于完全没有。”

## > 辅导提纲

### 思考题：

- 文章中使用的数据准确吗？
- 作者有明确的立场吗？如果有，请问他的立场是什么，如何展开论证的？
- 本文列举了 COVID-19 危机的哪些方面，相互之间是如何关联的？
- 该报道的逻辑顺序是什么？
- 这篇文章是如何使用来自武汉的声音 / 观点的？
- 中国及其如何应对新冠危机是被放在什么样的报道框架下展示的？

### 报道地域相关议题时的提示：

- 使用广泛的专家网络作为信息来源
- 提供背景信息
- 将事实放在上下文的语境中展示
- 尽最大可能核查每个事实
- 采访非常了解当地情况的人
- 避免给某些国家或地区贴上负面标签
- 将事实与观点分开，但将观点视为相关内容予以重视
- 避免（受影响）先入为主的主观预设，对特定国家和地区持有刻板印象和固有偏见
- 避免语言上出现地理或历史事实的错误

### 推荐阅读：

- Barnett, C. (2003). Culture and democracy: Media, space and representa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Wanta, W., Golan, G., & Lee, C. (2004). Agenda setting and international news: Media influence on public perceptions of foreign nation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2), 364-377.
- Thussu, D. K. (Ed.). (2006).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Routledge.

## 第八章 X 性别

53

新闻媒体在塑造，生产和改变我们的性别观念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性别刻板印象的传播不仅限制了听众对具体性别行为的正确认知，更是加剧了性别的不平等现象。麦奎尔 McQuail (2005) 指出“新闻内容依照特定的编码方式以深刻而持久的方式被不断生成” (第 122 页)。社会认知理论对新闻媒体如何促进性别构建有着非常详尽的阐述 (Bandura 2003)。大量研究表明，新闻媒体中对男性和女性的呈现很不一样。女性的展现更多的与母性，婚姻和家庭生活相关，而男性的呈现通常是具有显赫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或者是带有男子汉气概的核心人物 (Gauntlett, 2008 年)。女性呈现明显不足，更多带有错误暗示认为男性代表着社会规范，女性的角色微不足道，可以视而不见。例如全球媒体监测项目的研究结果发现，新闻报道中以女性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比例仅为 24%，而男性则占新闻话题的 76% (Macharia, 2020 年)。报告还指出女性的声音最有可能在健康或科学相关的新闻中听到 (35%)，而且在政治或政府相关的报道中女性的观点很少被使用 (16%)。即使女性被用作新闻来源时，通常也只是分享个人的经历 (38%) 而不是作为该话题的专家表达观点 (19%) (Geertsema - Sligh, 2019)。男性通常被描述为积极，坚韧，冷静不情绪化，争强好胜和富有竞争性，女性则被描述为被动，情绪化，敏感，顺从和不够称职的众生 (Furnham, Mak & Tanidjojo, 2000 年)。

在中国，关于性别问题的报告框架相对单一，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如家庭，学校和职场中的男权思想，女性的经济赋权，妇女的就业及职场遭遇的性别歧视，性骚扰，女权运动，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女性在公共场所的人身安全等议题都报道不足。近年来，在有关性别问题的新闻报道中还出现了一些曝光度很高的“戏剧化的反转报道”，主要是由于记者根据一面之词进行碎片化解读，信息链不完整的情况下便匆忙得出结论的结果。这些报道既没有语言的明确表述，也没有从根本立场上全面，彻底清晰地解释结构性的性别议题，性别关系和性别权力的不平衡问题。此外性别和阶级问题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性别本身已然不仅仅是带有阶级偏见的某种修辞表达。但是传统的性别问题，例如婚姻，也越来越深地与贫困和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纠缠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新型的双重交叉压迫。

## > 案例分析 针对歧视，表明立场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7/04/c\\_1124707340.htm](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7/04/c_1124707340.htm)

生育状况被认为是女性求职和就业的一个因素，而不影响男性。这则新闻报道以这个社会问题开始希望提高人们的认知度，并针对歧视问题表明立场。政策解读有助于读者提升对问题的理解，但是文章中对政策的解读逻辑不清，行文不畅，削弱了这则新闻的可读性。



# 女性求职就业总被问 生没生娃？

生育歧视何时休



该记者在生育歧视问题上立场鲜明。

新华网，中国  
July 4, 2019

弱势群体的声音表达是有吸引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可以有效引发读者的共鸣。中国西部哪个省的哪家中医医院？需要更加明确。

故事的来龙去脉要完整报道 - 张纯是否接受了这个带有歧视性的工作？如果接受，为什么会接受这份工作？如果拒绝又是什么原因？她在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份工作中是否纠结？

这个说法需要更加准确具体。这样一概而论的表述缺乏准确性，需要有证据的支撑。

倒装句的使用不太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也不利于视觉和逻辑的理解。中国读者的习惯是先看到说话的人是谁，然后再听所说的话。应该先介绍刘小楠，然后再引用他的发言。

余羽案例的使用很好地拓展了第一段中提到的张纯的经历。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在求职中存在而且工作九年之后依然会遇到。

需要提供具体日期。

这个大学的例子说明类似问题普遍存在，并且证实了余羽所说的情况。这个案例有着非常明确的结果。

“我们可以录用你，但做这个工作要扛机器、拍片子，你5年内不能要孩子。”刚毕业的新闻学研究生张纯在面试西部某省级中医院宣传部的一份工作时被如此要求。

“这简直就是就业歧视、生育歧视！”张纯气愤地说，招聘时用人单位还曾明确表示想招男生，“但当时没人报名，不得不录取我”。

时值毕业季，不少应届毕业女生有与张纯类似的经历。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招聘活动管理促进妇女就业工作的通知》，直指就业歧视中的种种现象，通知明确要求引导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拟定招聘计划、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人员过程中，不得性别优先，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

今年2月21日，人社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不得限定性别（国家规定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情况除外）或性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不得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虽然明确禁止就业性别歧视，但尚缺乏对就业性别歧视概念的界定和具体歧视行为的列举。”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刘小楠看来，上述通知进一步明确就业性别歧视行为，通过列举“六不得”进一步明确了就业性别歧视判定标准。尤其是针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明确规定“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等，对现行法律作了进一步明确解释，将有助于缓解当前基于婚育状况的就业歧视。

### “女同学面试几乎都会被问到婚育问题”

“你结婚了吗？有没有男朋友？近期打不打算要小孩？”

“2018年我换工作的时候，面试了5家单位，每次都会被问到这些问题。有3家单位表示如果要小孩，就会拒绝我。”余羽在职场打拼了9年，对这样的遭遇并不陌生，30岁还没有婚育的她对此感到尴尬而无奈。

余羽坦言，在面试中遇到这些问题，会感觉在求职的竞争中被附加了更多条件，“有的女生面试时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但最终公司人事回复，综合考虑及风险评估后不合适，问题多出现在婚育状况上”。

已经入职的女性也遭受生育问题困扰。近日，河北传媒学院内部制定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管理的规定》引发广泛关注。该文件提到，女职工怀孕必须要“达到规定的服务年限后，按照个人申请、分别按生育一胎或二胎比例排队、单位党总支书记（处室负责人）签字，报学校计划生育办公室审核备案。”对未报备怀孕女职工进行“全校通报批评，扣发6个月绩效工资”“取消两年内评优评先和评定职称”。

此规定一出，广受质疑，舆论认为该文件侵犯了职工的生育权，违反了相关法律。6月29日，河北传媒学院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学校已撤销了上述规定。

## 已婚未育女青年更易遭受就业歧视

36岁的金鑫说，在她面试的近10家单位中，有接近一半是因为她已婚未育而拒绝了。她。“我真想当面告诉面试官，现在不允许问这个问题了！”说起求职经历，金鑫一肚子委屈。

2017年，智联招聘针对全国近13万名职场人士开展的调查显示，22%的受访女性认为就业中性别歧视现象严重，比受访男性高出近8%。这份《2017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指出，在这些深刻感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女性群体中，25~35岁是个体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生育高峰期，处于这个时期的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感受到的性别歧视最为明显。已婚无子女的女性面临生育的“风险”，更易遭受就业性别歧视。

事实上，《通知》除了要求各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外，还明确建立健全女性劳动者维护平等就业权利的机制。

在刘小楠看来，促进平等、消除歧视已成为党和政府近几年来持续关注的议题。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201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就业要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消除性别歧视和身份歧视”。

## 解决女性就业生育歧视需要破除多道门槛

从事过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的金鑫说，“现在的企业非常现实，请一个人要花人力成本和培养成本。如果她怀孕了，少则4个月多则大半年会空一个岗位，工作没有办法进行，人力成本也不会降低。”

“出于工作稳定性考虑，这些问题我们都会问。”一位多年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社会招聘的本质是获得既成劳动力，要尽量避免人员浪费。如果一个女职员招进来马上怀孕，或者已经怀孕了，企业会进行更多考量。

刘小楠认为这些不能成为女性就业受阻的缘由，解决女性就业中的生育歧视需要破除多道门槛。她举了一个例子，国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各地普遍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将产假的计算方式调整为“国家规定假期98天+生育奖励假”。但是，很多省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没有明确延长产假的生育津贴是否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负担，以至于用人单位不愿意招聘未生育或可能生育二孩的城镇女性。

很不准确的称谓使用。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年轻人的年龄界定为10到24岁。<https://www.who.int/southeastasia/health-topics/adolescent-health>

关于36岁的金鑫的情况需要有更多的交待。文中她是在谈这次求职还是第一次求职的经历，很不清晰，提到的十次面试是针对一个职位连续进行的还是几年当中陆续经历的不同面试？

人力资源部的人员应该有真名实姓，或者加以说明‘此人要求匿名’。

这个表述需要更加准确，具体有多少个省份？具体是哪些省份？

刘小楠认为，女性个体的“生育成本”应由“社会整体”来补偿，包括由国家、用人单位和男性来共同分担。“禁止性别歧视、婚育歧视是中国批准的国际公约的要求，是中国国内法明确规定的，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这是无可置疑的。”刘小楠说。

刘小楠介绍，按照九部门的《通知》要求，可以通过畅通窗口来访接待、建立三条热线等渠道，及时受理就业性别歧视相关举报投诉，并且明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会组织、妇联组织等部门对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开展联合约谈；通过健全行政管理机制、加大监督和处罚力度，对就业性别歧视行为进行罚款，并把接受行政处罚等情况纳入人力资源市场诚信记录，依法实施失信惩戒。这些举措有利于对用人单位形成引导、教育和威慑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年底增设了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通知》也要求，积极为遭受就业性别歧视的妇女提供法律咨询等法律帮助，为符合条件的妇女提供法律援助，支持权益受到侵害的妇女积极维权。（见习记者刘言 实习生 顾航瑜）

（应受访者要求，张纯、余羽、金鑫为化名）

文章仓促收尾。有关权益部分应当进一步详细阐述，为女性读者提供信息和知识，让她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如果能有有关雇员权利争端的具体实例就会更有说服力。

### 思考题：

- 文中如何使用“未婚女性”和“单身女性”这两个说法的？两者含义有何不同？
- 文中的相关政策是如何解读的？
- 文中女性的声音发挥了什么作用，效果如何？
- 针对未婚女性的歧视本文作者是否明确表达了立场？如果是，作者是如何表达的？
- 本文是如何刻画未婚女性和单身女性的？

### 报道婚姻状况时的技巧提示：

- 避免根据婚姻和生育状况来评判女性
- 更多报道和关注未婚女性所面临的问题
- 称呼未婚女性时应当准确，单身女性，从未结婚的女性，寡妇和离异女性含义不同
- 关注报道更多挑战性别刻板印象的题材，反映女性在当代社会不断演变的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多样性
- 尽可能倾听并呈现未婚女性的视角
- 关注未婚和已婚女性的法律权利和利益
- 提供相关背景信息和法律框架
- 避免使用与婚姻状况有关的负面标签，比如“剩女”

### 推荐阅读：

- Gill, R., & Gill, R. M. (2007). *Gender and the Media*. Polity.
- Gauntlett, D. (2008). *Media, gender and identit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 第九章 X 婚姻状况

61

结婚率下降和单身人数急剧增加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发展普遍趋势。但未婚人士依然在一些媒体中被视为‘例外’和‘超出常规’的现象。在中国，单身仍然被认为是偏离正轨和有问题的，婚姻仍然是社会和文化的常规模式。新闻报道中总会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姻状况评头论足。单身总是与耻辱挂钩，这本身已经妨碍了他们的人权以及他们本应享有的正常的社会，文化和公民生活。而对于已婚的人，他们的婚姻状态通常不被提及。相比之下，如果未婚人士是新闻报道的主题，他们的未婚状况经常会成为叙事的核心元素，作为一种个人行为‘缺陷’而备受指责，即使这与整体情况没有太大的关系。

新闻报道框架是性别刻画时经常用到的报道工具（Neuman 等，1992）。这样的框架往往成为性别形象创造，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设定的背后依据。放大突出个体的婚姻状况只是帮助构建一个感知的现实的例子之一。新闻报道将未婚状况放到造成社会分裂的一个因素的框架下加以审视，夸大了性别的不平等，这种框架深深扎根于现实的文化概念化当中（Entman, 1993）。总而言之，中国的新闻媒体中与婚姻状况相关的报道框架巩固了占主导地位的婚姻和家庭主义的常态认知；相反，不把常规家庭状态作为首选的其他思维方式被边缘化（Jackson, 2013）。

中国媒体中亲婚姻报道框架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性别规范期望意识的强化和自然化。中国媒体看待单身女性和男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Gong 等，2017），比如媒体上广泛使用的“剩女”一词，而单身男性则为“钻石单身汉”。与媒体中对单身男性的刻画相比，中国主流媒体更倾向于夸大单身女性的‘不足’，影射她们更易于与其他社会群体发生冲突，指责她们威胁社会的稳定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张，2018）。“剩女”们往往被指控为过高地估计自己，缺乏女性的传统美德以及由于未婚而变得挑三拣四。尽管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规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异性已婚夫妇（育有子女）仍被视为成年人的正确生活方式和理想的广义社会构成模式（Koropecj-Cox & Pendell, 2007; Rothrauff & Cooney, 2008）。媒体刻意宣扬厌女议程，进一步放大和美化传统家庭模式和其中的理想女性角色（Gaetano, 2014 年）。媒体对婚姻状况的反复强调有助于树立一种观念认知，即女性的价值由婚姻状况决定，针对单身女性进行污名化的指责，用“没有责任感”，“不完整”，“不成熟”，“孤僻”，‘有所缺失的人’等字眼贬低单身女性对社会发展的贡献（Zhang, 2020）。媒体刻画的单身女性刻板形象虽然可能不会影响她们各自的生活（单身女性甚至不愿接受这样的信息），但这些信息依然会对她们的父母和同伴造成很坏的影响，从而再次强化了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女性自我价值的最终评估仍然要通过其婚姻状况来完成。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30520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305205)

这篇文章通过报道一位女性因未婚身份而被拒绝冻卵而起诉医院的法院案件，表明在未婚女性生殖权利问题上的立场。但是，报道中对单身女性和未婚女性概念的混淆滥用使故事的主题变得复杂。

# 北京单身女子冻卵被拒 起诉医院

## 关注首例未婚冻卵案背后两难

新闻标题成功传达了该报道案例的核心内容，没有使用任何煽动性或耸人听闻的语言。

红星新闻，成都，中国  
2019年12月21日

去年年底，在北京工作的徐女士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冻卵”，但因为是单身，无法提供结婚证被拒，随后她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法庭。

前不久，徐女士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这起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将于2019年12月2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

徐女士及其律师于丽颖表示，她们多方了解之后，发现这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益的诉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宣传部门负责人则表示，目前医院是按照政策办事。徐女士则期望通过这一起诉讼“撕开一个口子”，让人们关注到单身女性的生育需求。

事实上，单身女性“冻卵”背后还有着深层的法律价值争议。支持单身女性“冻卵”一方面包含着对女性生育权和非婚生子女权益的保障，另一方面却可能对传统观念、公序良俗和儿童权益保障形成挑战。

2017年，国家卫健委曾在相关回应中提到，法律未否认单身女性生育权，但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目前通过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单身女性生育权做出具体规定，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论证，应审慎推进临床应用。

无论如何，被称为国内首例未婚冻卵案的这一起诉讼，值得被关注。

### 女子冻卵因单身被拒 起诉医院歧视女性侵犯一般人格权

徐女士31岁，单身，随着年纪增长，她越来越能感受到身上肩负的父母养老的责任，开始为自己人生的重大选择做规划。她希望通过早已成熟的“冻卵”技术留下自己生育黄金年纪的卵子。这也许是未来五六年内的一剂“后悔药”，能让她和父母感到踏实一些。

徐女士在去医院前，她就从相关的社群里了解到，“在北京，医院不能向单身女性提供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但是身边并没有人直接向医生了解过，或许医生能给出一些建议。于是徐女士挂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专家号。

2018年11月14日，徐女士被通知前往医院的东院区就诊，通过面诊和一系列检查，12月10日，她再次挂号就诊，检查结果确认她的身体状况良好，符合冻卵需要。但她的冻卵要求，却因无法提供结婚证被拒。医生告诉她，有文件要求，不能给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技术。

医院的拒绝让她感到“很窝火”，随后她决定起诉医院。

徐女士的代理律师于丽颖告诉记者，最初起诉的案由是合同纠纷，但是法院没有受理。随后再次变更案由为“一般人格权纠纷”，今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受理了该案。

起诉状中，原告认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行为是对原告女性身份的歧视，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等相关规定，侵害了原告的一般人格权。”

一语点出了这个故事值得报道的原因（新闻价值所在）

这个官员应该有名有姓，或者加注‘本人要求匿名’的说明。

这个故事为何值得报道总结得很好。。

到底是因为单身还是未婚人士？单身和未婚群体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应当更加准确。

身份不清 - 可能让读者对内在身份产生疑惑。是指她有男朋友，还是未婚？提供了这个事件的准确起因。

概念不清。没有结婚证不等同于单身，应当还包括从未结过婚的，离婚的，丧偶的人群。目标人群的范围有很大的区别。这里提到的医生应该使用真实姓名，或者加注此人‘要求匿名’的说明。

需要解释当地法院为什么拒绝，帮助读者完整理解该报道。

此处用词不准确，‘再次’意思是第二次的变化，而实际上这是第一次发生变化。错误使用‘再次’似乎有意暗指许女士的人品。需要解释为什么前后案件起诉的理由不同。

徐女士的诉求很明确，希望判令医院停止对自己一般人格权的侵害，为她提供冻卵服务。

12月23日，该案将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

### 医院回应是按照政策办事 相关规范禁止为单身女性“冻卵”

2015年8月2日，央视新闻报道指出“国内一位女艺人称自己在美国冷冻了卵子，并称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而原卫生部（现国家卫健委）规定，单身女性不能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手术。有的医院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但在使用冷冻卵子时必须提供身份证、结婚证、准生证。”

单身女性不能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手术的依据是什么呢？

12月20日，红星新闻辗转联系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宣传部门负责人，其表示，“这和医院没有关系，目前医院是按照政策办事。”这名负责人称，“医院执行的是2003年国家卫计委《辅助生殖技术管理规范》。

红星新闻查询发现，早在2001年原卫生部就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这份文件的第十三条“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当符合卫生部制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规定”。而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有一条规定明确：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该“规范”在随后的几次修改中都保留了上述规定。

### 吉林多年前曾出台地方性法规 但实际并无单身女性成功通过申请

徐女士说，她起诉医院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她还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有了生育需求。这是时代条件下女性的一个真实状况。”

徐女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曾了解到吉林省出台过相关规定，允许单身女性借助辅助生殖技术生育。

对此，红星新闻查询资料发现，《吉林省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然而17年过去，尚无一例单身女性在吉林成功通过申请借助医学手段生育。

来自吉林的马女士告诉红星新闻，2016年她曾以单身女性身份，向吉林4家医院申请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均被拒绝。马女士在一份记述中写道，即使自己向医院搬出《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规定，仍遭到医院的拒绝。

这位女性明星是未婚吗？这句表述中没有提供有关她婚姻状况的任何线索。

此处需用使用引号。

将现有案例与过去的案例背景关联可以为报道提供深度。

此处应为红星新闻的记者。

此处记者进行了事实查证，很好。

这个说法来自何处？如果是记者本人说的，应当有数据支撑这种说法，如果不是那么需要提供信息来源。

此处的例子不足以支持‘尚无一例成功案例’的说法。最好提供观点统计数据。

医生应该有实名，或者加注本人‘要求匿名’的说明。

这里很清晰地解释了 176 号文件的具体内容。

这里很好地展示了记者的专业态度，试图收集和验证多方证词的准确性。而不只是倾听一面之词。

深度的报道需要包括相关的各方当事人，相关的学者和专家，以及官方权威机构给出多种角度。

这个说法出自何处？如果是记者本人，那么需要王教授的访谈来支持这个论点，如果不是，则需要注明信息来源。这是一个报道形式选择和布局的问题，如果引用王教授的原话会比记者在此总结和解读好很多。

提供相关的法律背景来深入浅出地普及与生殖权利相关的法律条例。

与前面 27 页的描述相矛盾，“但是，2003 年，卫生部颁发了 176 号文件，吉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规定就自动失效”。

与先前描述的马女士在吉林向医院提出四次申请的情况相矛盾。

当时，吉林省人民医院生殖中心的医生告诉马女士，2002 年颁布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当时是生效的，但是 2003 年国家卫生部颁布了 176 号文件之后，《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该条条例就自动作废了。2003 年之前吉林省没有相关案例。不光吉林省不能做，全国都不能做。

这位医生提到的“176 号文件”正是《卫科教发〔2003〕176 号—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这份文件包含了目前指导医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按照《立法法》，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12 月 20 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了吉林省卫健委宣传处、法规处，试图进一步就此事采访，但未得到工作人员回复。

### 原国家卫计委曾公开回应 法律未否认单身女性生育权 但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

长期从事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向贤，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与非婚生育在欧盟国家得以主流化的条件相比，我国目前基本没有非婚生育成为新生人口重要来源的可能，但这并不代表非婚生育的现象不存在。

但非婚生育目前我国直接面对的是儒家三位一体生育观与计划生育管理体制联手形成的生育理念和生育权力分配。因为它要求一系列前提如，生育是公民权，国家权力不可随意扩张，亲密关系和性倾向可自由选择，生育与婚姻不应捆绑，生育可异性性交而实现、也通过人工受精、代孕生殖辅助等方式实现等。

红星新闻记者在国家卫健委网站查询到，2017 年 12 月 17 日原国家卫计委官网回应“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提议”称，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未否认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婚姻法》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原国家卫计委的回应还提到吉林省，“实践中，个别地区结合实际制定了有关规定。如吉林省 2002 年 9 月 27 日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之后历次修订，吉林省均保留了此条规定。据了解，该规定实施 10 余年来，尚无 1 例单身女性申请借助医学手段生育。”

该回应还表示，目前通过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单身女性生育权做出具体规定，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论证。

一是我国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未对单身女性生育权作出明确规定。作为下位法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应当遵照宪法制定相关规定，不应超出宪法规定范围；二是对单身人士生育权通过法律进行许可，与我国传统价值、公序良俗不相符合。

加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法律层面对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进行限制，也充分体现了对儿童权益的保障。对现实中有些单身女性生育而无法核实孩子父亲的情况，有关部门本着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妥善予以处理。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广泛深入调研，加强研究论证，密切关注“冷冻卵子”等技术发展，积极做好可行性研究，审慎推进临床应用，完善相关法规法规，切实保障单身女性合法权益。

这个说法出自何处？是记者的观点，还是先前的国家健康计划委员会的观点？如果是记者，请提供论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不是，则需要注明信息来源。如果是国家健康计划委员会说的，需要使用引号。这里犯了一个报道格式选择错误，如果引用王教授的原话会比记者总结和解读要好很多。

这个新闻报道没有结尾，最后两段的内容来自国家健康计划委员会，很不清晰。新闻故事以一个正在进行的案件开始，因此最好以‘请继续关注某月某日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后续报道’或者是‘我们将继续向您报道此案的进展’。最后段落中的信息对于读者掌握整体情况至关重要。很多人不一定读到最后，因此读者不一定能够看到结尾。最好能将一些重要信息在文中尽早出现，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并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

## > 辅导提纲

要求学生准备性别歧视的亲身经历。将班级学生分为三组角色：记者，女性和政府官员。从每个组不同的视角充分讨论。然后返回到这篇报道并讨论以下问题：

- 在这个故事中听到了哪些群体的声音，有主导观点吗？
- 拒绝徐女士冻卵的原因有哪些？
- 这个报道中的叙事逻辑是什么？
- 本文中对相关法律，政策和法规的引用起到什么作用？
- 作者在性别歧视问题上如何展示自己的立场？
- 这篇文章中对女性是如何刻画的？

可以带世界记者联盟的 IFJ 道德准则和任何其他道德准则 / 使命声明作为参考资料，有助于讨论以下有关无偏见性别报道的技巧提示。

- 避免性别刻板印象的描述和呈现
- 避免无故提及女性的身体，外貌，婚姻状况和生育状况，除非与报道有关
- 更多关注女性面临的问题，例如家庭暴力和性骚扰
- 策划更多挑战性别传统刻板认知的报道，展示当今时代不断演变的性别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多样性
- 注意新闻报道中两性出现的频率，影像和担当的功能保持性别平衡（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法律，体育和科学题材的新闻），尝试在信息源使用上注意性别平衡。
- 尽可能倾听和展示女性视角，尤其是女性专家学者，政党和利益相关者中女性成员的观点
- 提供背景信息和法律背景
- 注意措辞和表达。
- 避免使用带有明显性别歧视色彩的词汇或图片
- 避免过度消耗女性身体影像和性特征
- 避免使用负面标签。

## 推荐阅读：

- Gong, W., Tu, C., & Jiang, L. C. (2017). Stigmatized portrayals of single women: a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 coverage on single women and single men in China.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6(2), 197-211.
- Johnson, K. M. (2017). Single, straight, wants kids: media framing of single, heterosexual fatherhood via assisted reproductio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6(4), 387-401.

# 第十章 X 性取向

69

长期以来 LGBT+ 群体都被媒体错误描述成一个社会问题，认为他们直接威胁社会的稳定，儿童的成长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21 世纪之前，对男女同性恋的描写主要出现在犯罪题材或简短新闻中，女同性恋的阳刚之气和男同性恋的阴柔气质通常受到嘲笑（Streitmatter, 1998）。大多数报道采用的是来自精神病专家，军方，执法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二手资料，而 LGBT+ 群体很少被采访，他们自己的声音也很少被听到。

2000 年之后，不断增加的媒体报道提升了这个群体的曝光度，但是新闻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性别不愿被定义者（酷儿），和间性人（LGBTQI）的危机上。对他们的刻画通常是系统性的评判，谴责，边缘化，琐碎化，排斥，刻板描述和压制。

这样的不公平对待肯定会给整个社会灌输一种针对 LGBT+ 群体的错误认知，提升了对对其进行社会和道德审判的危险（Klin & Lemish, 2008）。对该群体的不准确，负面，一边倒，不完整的媒体叙事会导致整个社会对 LGBT+ 个人，群体和社区的负面舆论和污名化认知（Clement 等，2013）。这类新闻报道反映了对 LGBT+ 群体在社会，文化和政治范畴的压制。值得注意的是对少数群体的负面和不准确的刻画会对该群体成员如何认知自己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会极大地影响多数群体对他们的认知。

与 LGBTQ + 群体相关的话题最近在中国主流媒体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除了顺性别男同性恋之外，主流媒体很少关注 LGBT+ 群体中的其它成员。针对 LGBT+ 群体的报道中很容易发现不准确，刻板印象，偏见，冒犯，歪曲和责难的内容。相比之下，报道中似乎非常缺乏对性取向和性别身份表达（SOGIE）等议题的清晰简洁的理解和认知。同性恋的报道总是被设定在‘传染病’的框架中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传染病’通常是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婉转代名词而已。反复强调 LGBT+ 个体和艾滋病毒 / 艾滋病之间的联系更加强了人们将同性恋视为艾滋病来源的错误印象。这些新闻报道会继续制造并加强针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最终可能导致更深层更严重的歧视。

一些新闻报道逐步脱离传统的“同性恋与艾滋病毒 / 艾滋病”框架，而是专注于向听众介绍影响 LGBT+ 群体的话题。尽管如此，这类报告仍缺乏对该群体的人文关怀和尊重他们的公民权利。而且在这些报道中仍然可以看到明显的性别偏见和失衡的报道。正如其它新闻报道一样，关于 LGBTQ + 的报道同样大比例地倾向顺性别男同性恋人群，主要关注他们的情感经历和遭受的社会压迫等，而忽视了 LGBT+ 群体的其它成员。主流新闻媒体在影响和引导公众舆论和意识觉醒方面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正是由于主流媒体对该群体报道的严重缺失，才使得性别话题被屏蔽，无法展开公开自由的讨论。在逐步走向民主，自由，多元和包容的社会发展道路上，主流媒体有义务保障少数和边缘化群体能够发出他们的声音，充分行使他们应有的权利。

## > 案例分析

# 不要传播错误信息

<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2/0812/c1007-18723953.html>

在中国，因误解，歧视和传统观念所困扰的同性恋者困境不容低估。本文试图普及有关同性恋的知识，但作者缺乏对与同性恋有关的最基本的常识和认知。

## 科学解释同性恋 到底能不能治愈

这篇文章并不是新闻，但是在中国媒体上被普遍作为新闻转发。



人民网，中国  
2012年8月12号

最好有官方数据支持这样的说法。应该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根据 2014 年科学研究所的平均统计数据，中国同性恋人群可能有 7000 万。

这些问题清晰地展示撰写本文的记者缺乏对同性恋群体的基本常识的认知。

这篇文章发表于 2012 年。因此《同性恋研究》一书发表于 30 年前。

提供故事的正反两面很好。但是由于列举的例子过时和不具备代表性，因此不太有说服力。与其使用过时和不具代表性的案例，不如动笔之前多花些时间做更多扎实的调研。

中国每 100 个人中就至少有 1 个同性恋。如果有办法能够“治愈”同性恋，会不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呢？或者，同性恋患者是否需要“治疗”呢？孰对孰错？孰优孰劣？应该由当事人自己定夺，社会应该给与们充分的尊重。

20 年前 (1979)，著名性心理专家威廉·马斯特和维吉尼亚·约翰逊夫妇共同出版了《同性恋研究》(Homosexuality in Perspective)，宣称他们成功地将同性恋转化为异性恋。

在马斯特夫妇的研究中，他们选取了 67 名对自己的同性倾向不满的同性恋者进行治疗，其中 12 名非常确信自己是同性恋，接受了“转化疗法”；另 55 名则相信自己的同性倾向是暂时的，因此接受了“逆转疗法”。在接受两周治疗后，只有 14 名同性恋者的治疗效果不明显。五年后，再次进行追踪调查发现，治疗的成功率高于 70%。

同性恋真的可以“治愈”吗？

正在《同性恋研究》出版之际，人们却对其研究案例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马斯特所在诊所负责约见患者的琳恩 (Lynn Strenkofsky) 表示，她从未见过那 12 名接受“转化疗法”的同性恋患者。据该诊所资历最老的精神治疗专家马歇尔和佩吉表示，他们根本不提供同性恋治疗服务，也从未听说过“转化疗法”。当诊所的最高负责人罗伯特·科洛德尼 (Robert Kolodny) 要求查阅研究案例时，马斯特拒绝了罗伯特的要求。这让马斯特的妻子约翰逊也不得不怀疑“转化疗法”是不是杜撰的。最后，该研究著作的出版不得不取消了。

事实上，同性恋是否能够完全“治愈”，仍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性态度受到环境和外界的影响，例如幼年成长过程、家庭背景、性格、气质、同侪的压力、性侵犯及同性间的性经验，因此，同性恋是可以“治愈”的。许多同性恋辅导的成功案例表明，同性恋性倾向可以改变，而且有些男同性恋经辅导后还与异性结婚过着婚姻生活。一些宗教组织相信同性恋是可以改变的，并为同性恋者提供转化疗法 (conversion therapies) 来改变他们的性取向。

数据展示之后紧接的问句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暗示在中国最好能够治愈大量的同性恋人群。

性心理学家的英文应大写。

使用 30 年前一个过时的研究很难提供对论点任何强有力的佐证。

这个问题没有争议。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同性恋可以被改变，医疗机构也警告说所谓的治疗方法是无效并且具有潜在的危险和危害 (Drescher & Zucker 2006; Ford 2001)。

最后一段中最好运用另一个观点来批评文中的‘一个观点’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有关同性恋问题的科学视角。

需要做更多调研。

这篇文章的作者知道应该提供正反两面的争论，但是这部分的反方观点与前面的资料并不匹配，前面已经说过同性恋已经不再被划为精神疾病了。还有此处选择的数据完全过时。

整篇文章只不过是大量列举过时的研究，而缺失作者本人的视角。

而一些科学研究观点则认为，同性恋是基因决定的，改变不了。研究人员通过对同性恋者大脑进行解剖发现，同性恋男性的大脑与异性恋女性的大脑相似，而与异性恋男性的大脑存在区别。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双胞胎是同性恋者，则另一个是同性恋者的比率会增加 50%。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丁·汉默通过基因研究发现，同性恋者和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在其 x 性染色体长臂顶端区域有一个叫做 Xq28 的基因，这一基因决定了人们在性指向的同性恋。此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奥登·伍德通过雄性果蝇的同性恋行为也旁证了同性恋基因的存在。

关于同性恋是否能够完全“治愈”，也许科学研究现在还不能盖棺论定。但是，是否需要同性恋进行治疗，却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

医学界和科学界普遍谴责对同性恋的“转化疗法”，认为它们给患者带来的压抑感有时会导致患者自杀，或者产生自卑感。因此，1973 年美国精神并协会将同性恋作为精神病分类单位从《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DSM)》中删除。并于 1997 年通过决议，表示从事同性恋“转化疗法”的医生将被认为是缺乏职业道德的。在中国，2001 年 4 月 20 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版，同性恋不再被划为精神疾病。

但是，也有人对此持反对的意见。如，1985 年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Robert Perloff 表示：1) 现有的研究并不全面，做出一面倒的判断并不合理；2) 若同性恋当事人真的想改变性倾向，应该首先尊重和聆听他们的意愿；3) 美国心理学会的这种绝对化主张将会阻碍未来有关的研究。

的确，孰对孰错？孰优孰劣？应该由当事人自己定夺，社会应该给与他们充分的尊重。

在为什么是伦理议题的问题上需要做进一步的阐述。

整篇文章的数据源都是来自于美国，但是文章的读者是中国人，因此需要提供更多与中国相关的数据。例如，2001 年 4 月 20 日，“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第三版发表，同性恋不再被列为一种精神疾病。因为不再是一种疾病，因此不应当使用治愈一词。还需要更新更近的数据，最好还要解释法律的相关背景信息。

## > 辅导提纲

### 思考题：

- 文中引用了多少个研究项目？它们分别是什么项目？
- 文中数据的使用有效性如何？
- 文章的结构如何有助于社会身份这一核心含义的构建？
- 这个故事的逻辑线索是什么？
- 作者针对同性恋是否可以治愈的说法是否提供了明确的立场？
- 文中是如何描述性少数群体的？

### 报道性取向议题的技巧提示：

- 报道诸如犯罪等负面事件时，避免强调嫌疑犯或犯罪者的性取向，除非性取向是犯罪的主要原因
- 公平展示 LGBTQ+ 群体和相关议题
- 从平等和人文关怀的角度报道 LGBTQ+ 丰富多样的生活和文化
- 应该倾听 LGBTQ+ 群体的声音
- 尊重文中有关的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并尊重个体的声音和观点
- 明确反对非异性恋人群应该并且可以治愈的观点，对性少数群体有意传播艾滋病毒或对社会有害的观点要明确反对
- 避免使用性少数群体作为娱乐标签夺人眼球
- 避免使用带有歧视，侮辱和煽动性的语言
- 传播有关 LGBTQ+ 群体的常识

### 推荐阅读：

- McInroy, L. B., & Craig, S. L. (2017). Perspectives of LGBTQ emerging adults on the depiction and impact of LGBTQ media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1), 32-46.
- Hu, K., & Li, X. (2019). The Effects of Media Use and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Beliefs on Tolerance of Homosexuality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147-172.
- Mocarski, R., King, R., Butler, S., Holt, N. R., Huit, T. Z., Hope, D. A., ... & Woodruff, N. (2019). The Rise of 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Representation in the Media: Impacts on the Population.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12(3), 416-433.

# 第十一章 X 年齡

75

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它既给新闻记者带来挑战，也使他们拓展新的机会，能够及时捕捉到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社会议题。老年人是主流媒体忠实的主体受众，但是这个群体，特别是年长的女性群体很少被关注，相比其它社会人群可见度要低很多 (Vasil & Wass, 1993)。而那些即使被报道的老年人通常也是“负面的形象，老年角色很少是主角或者很不丰满” (Hillier & Barrow, 2014)。需要了解的是大众媒体对老年人的刻画对构建整个社会对待老年群体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影响。媒体不仅会影响公众对老年群体的认知，而且媒体所描绘的对待他们的观念，思想和态度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待老人的态度和方式，甚至影响政府或相关部门制定直接与老年人群相关的政策和制度。

在中国，以老年人以及他们关心的话题为题材的新闻报道与老年人的人口总数不成正比，而且大量报道关注的是人口中的年轻群体，一旦涉及年老人群，报道数量便会大幅度下降 (Ren, 2013)。大部分关于老年人的新闻内容通常涉及地方上的老年个体。与此同时，近年来国际新闻报道中涉及老龄群体的话题比例随着国际交流和开放度的提升而有所增加。至于具体到新闻话题，对老年人富有社会责任的题材占比很高，出于政治和人性化导向而关注老年人议题相对普遍 (Cheng, 2012)。从歧视交叉的角度看，对老年女性的关注低于男性，而且多被描写为心理消极并且非常老态的社会形象，而且相比之下，报道对象中身体不健康的老年人比例高于健康者的比例，但是在过去 15 年中这个特征呈下降趋势 (Liu et al.2016)。

## 将引语置于上下语境当中

[https://www.bbwc.cn/article/2018/03/06/100070612\\_1.html](https://www.bbwc.cn/article/2018/03/06/100070612_1.html)

这则短新闻是关于英国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发布的一个报告 - 报告说英国老年人应支付更多的房产税来帮助英国的年轻人。该新闻案例旨在说明记者对信息来源的依赖以及使用引文时要交待上下文语境的必要性。新闻结尾还提供了更多关于该基金会行政主席的身份以及他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的背景信息。

### 英国智库报告呼吁

# 加征英国老辈的财产税 来帮助年轻一代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网  
March 6, 2018



此处应该注明新闻报道的具体日期。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英国决议基金会声称英国应该对老年一代征收更高的财富税以减轻日益增长的年轻人的负担。

有关‘婴儿潮出生的一代’需要给中国读者提供相关的解释，因为在中国没有类似的表述或者含义。

需要有确切的日期。

决议基金会执行主席戴维·威利茨勋爵周一所做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到 2040 年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老龄化时代将驱动健康医疗的大幅度提升，福利支出额度将达到相当于目前 600 亿英镑（830 亿美元）的总值。

最好改用人民币作为货币单位，便于中国读者快速理解。

他说：“现在是时候让战后‘婴儿潮’一代该伸手掏自己的腰包了。”“否则面临的另一种选择是将基本税率提高 15 便士，主要由我们的孩子支付。请问这是我们这一代，坐拥国家一半财富的一代人，希望留给我们的儿辈孙辈的遗产吗？”

针对什么的另外一个选择？是指给年老的人群征收更高的财富税？要加征多少？

提供更多有关威利茨勋爵的背景信息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威利茨勋爵曾是保守党影子政府高教部部长，他主张对英国市政税和遗产税进行改革，市政税是基于房产而征收的地方税收主要用于提供市政服务。他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会引发年轻人的怨恨和不满，因为他们已经很难达到前辈所能够享受的生活水准。

### 思考题：

- 这则新闻稿件讲述的故事是什么？
- 是否包括了新闻报道应具备的 5W + H（谁，什么，何地，何时，为什么以及如何）的基本要素？请明确列出。
- 这篇新闻稿件提供了哪些背景信息？
- 该报道中如何描绘和刻画老年人的？
- 如何将这则新闻稿件变为深度新闻报道？

### 报道有关老年议题的技巧提示：

- 老年人遇到的问题的角度报道老年主义议题，例如财务，健康，人际关系和歧视问题的种种挑战
- 更多报道积极正面的故事，反映老年人尝试各种非凡的体验，追求自己特殊的兴趣爱好，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等
- 应当倾听老年人的声音
- 提供社区服务的实用信息，比如社会保险和医疗看护等方面的相关信息
- 提供背景信息和法律背景  
注意措辞和表达，避免使用负面标签

### 推荐阅读：

- Edström, M. (2018). Visibility patterns of gendered ageism in the media buzz: a study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and age over three decade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8(1), 77-93.
- Vasil, L., & Wass, H. (1993). Portrayal of the elderly in the media: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gerontologist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9(1), 71-85.



## 第十二章 X 残疾

国际残疾人权利运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发展，并最终主流化，成为今天的“社会性的”残疾模式。这种残疾模式指的是人们尽管可以接受与身体的残障共存，但实际上导致残疾人无法正常生活的真正障碍是社会本身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物理的障碍。残疾人自己站出来试图改变人们对他们的认知和刻板印象。残疾人在媒体眼中依然是隐形的文化群体。即使在媒体中出现也被刻板归类为以下六个最常见的框架之一：受害者，英雄，威胁，无法适应者，需要被护理的人或者根本就不该生存下来的人（尼尔森，2000年）。

社会学家汤姆·莎士比亚（Tom Shakespeare）认为，媒体对残疾人的刻画使他们难以融入社区，甚至还会拉大他们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距离（1994年）：“人类对残疾的某种怪异和近乎特别的关注，怀有的恐惧和厌恶心理，正是因为残缺本身代表着人类生存本身与生俱来的身体性和动物性特征”（第296页）。

也就是说，正是媒体对个人残疾的强调才将他们与身体健全的人组成的社会‘区分’开来。记者经常把关注点放在个人残疾的医疗方面，其实这与故事本身关系不大。在一些有关残疾人的文章中，他们因为有残疾，有些事不可为就被设定是“另类”。这种对残疾人的异化和疏远“清晰展现了残疾存在的真实政治和社会背景，以及残疾人为了能在这个世界获得一席之地必须付出的实际努力，而这个现实都被过多突出各种各样的障碍而被掩埋”（Titchkosky 2000，第133页）。这使得残障人士更难融入媒体之外的主流社会。

中国正迅速进入人口的老龄化时期，拥有的残疾人数量也最多。预计五年之后中国的残疾人总数将超过1个亿，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媒体针对残疾人群报道

的特征是媒体呈现不足，故意煽情（同情怜悯，不够重视且夸张的视角），还有就是过多突出官方的话语体系（Feng, 2017）。报告的频率跟着“假日”安排走 - 平时报道较少，而在与残障相关的节日（如国际残疾人日和中国残疾人日）的时候则进行爆炸式的报道（Feng, 2017年）。就报道主题而言，通常残疾人的报道都集中在自我完善，关爱和福利等议题上（Meng, 2013年）。大多数新闻故事仍将残疾人描述为“悲惨的”，“需要帮助的”，“无助，可怜和容易受到伤害的”，“鼓舞人心和坚强的英雄”以及“不确定的冒险者”等，这些有害的刻板印象不断被重复。相反却非常缺失从非刻板印象和尊重平视的视角报道残疾人（Jing, 2013; Wu, 2014）。这种不平衡的报道使得残疾人“在正常话语体系中反而显得异常”，甚至误导或限制了公众对残疾人的正确认知。就报道的内容而言，全国性报纸，地方报纸和专门报道残疾人的报纸内容千差万别。全国性报纸倾向于从政府的角度介绍针对残疾人国家所采取的行动，方案和倡议。地方报纸倾向于从残疾人人权的角度揭露曝光各种侵权和违规行为。

专门针对残疾人的报纸倾向于关注残疾人救助和来自专家的康复知识等专业性的内容。就新闻框架而言，全国性报纸更倾向于使用仪式框架，定义事件框架，政客职业成就和慈善框架，以展示全民的助残意识并营造一种关爱的氛围；地方报纸重点关注残疾人的人权，将他们视为独立的个体，经常使用的报道框架有：问题曝光，监督，社区角色等。而面向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报纸，为了体现‘关注残疾人和为残疾人提供科学服务’的总体特征，倾向于使用政治家，社会公共福利以及科普框架进行报道（刘，2018；曹，2018）。

## 基于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公共利益

[http://www.xinhuanet.com//2017-08/22/c\\_1121519588.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7-08/22/c_1121519588.htm)

2017年，共有940万学生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中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有七名完全失明和弱勢的考生使用了盲文考卷参加考试。这则新闻报道的主角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描述了他考上大学之后所面临的困境。这类关注和倡导弱勢群体利益的报道需要认真措辞，以充分反映媒体的人文关怀。

### 东北师大一盲人新生 申请住校被拒

不应直接称呼他们为“盲人”，正确表述应为视力障碍或低视力的人。

北京新闻  
2017年8月22日

因为是第一次在文中出现，应该使用校名的全称，东北师范大学，后文中可以使用缩写名称。

盲的意思是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从文中可以清晰地知道王冲只是有视力障碍的一种，低视力而已。全盲与低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王宠是东北师大数学系 2017 级新生，也是该校招收的首位盲人学生。经历过高考“一个人的考场”，以高出本一线 88 分的成绩被录取后，王宠发现，自己的大学之路依然不平坦。8 月 17 日，来校报到的第二天，王宠被告知，校方“出于安全考虑”，未给王宠分配宿舍，而是要求其在家长陪同下在校外租房。



因为几乎全盲，王宠需要把字号调大，眼睛贴近屏幕才能看清字。受访者供图

能够看清字与全盲自相矛盾。正确表述应当是低视（最高矫正视力相当或者高于 0.05，低于 0.1）。



王宠东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

昨日，新京报记者获悉，东北师大将以补助形式，承担王宠房租费用，但仍拒绝安排其入住集体宿舍。对于王宠家人提出的，配备导盲犬或助残车辅助王宠日常学习，校方则一直未正面回应。

### “一个人的考场”

时间倒回今年6月7日，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实验小学理科特殊考场内，仅有的一名考生用双手摸索试卷，然后用笔作答，在他身后和讲台上，一共站着3名监考老师。

中国残联消息，这一天，全国共有7名盲人考生，通过使用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安徽宿松“一个人的考场”上的考生王宠，正是其中之一。

王宠的父亲王庭槐告诉新京报记者，1999年，王宠刚出生时，便患有严重的视力障碍，经过多方救治未见起色。王宠成年时，双眼视力只有0.05，几乎全盲。

2014年从安庆市聋哑学校毕业后，王宠考入青岛盲人学校读高中。“那一届几百人报考，一共只招收了25人。”王宠的班主任表示，能够进入青岛盲校，本身已经过激烈竞争。

按照班主任程老师的说法，盲人学生到高二后，将进行分班，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普通高考或者单招单考。如果参加单招，难度相对较低，但可选择的专业很少，大多为针灸或推拿，毕业后也将从事相关行业。如果参加普通高考，则需要与同一届考生在同一起跑线竞争，难度很大，很少有盲人学生走这一条路。

两者之间，王宠选择了普通高考，希望拥有正常的大学生活，加之对数学专业比较感兴趣。“我想做一名老师，即便难度再大，也要和其他正常学生一样，在同一个考场竞争。”

6月26日，王宠通过电话查询得知高考成绩为575分，高出安徽省理科本一线88分。

### 无法入住学生宿舍

高考出分后，王宠填报位于吉林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并被该校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录取。7月25日，一封盖着红色公章的录取通知书被寄到家中。王庭槐说，那一刻，自己“比王宠还高兴”。

8月15日，一家人踏上北上的列车，并于次日抵达长春，前往东北师范大学报到。

办理入校手续时，王宠感觉到了一丝异样，其他学生在注册入学后即可获得的宿舍钥匙，自己却迟迟无法拿到。王庭槐据此向学院咨询，被告知，王宠能否入住宿舍“还没定下来”。在校外宾馆住了一天，8月17日，

这句的结构带有煽动性，因为句子的后半部分是重点。应当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拒绝为他安排集体住宿，但是可以以补贴形式，承担他的房租费用’。

这个具体细节是个很好的范例说明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细节描述可以赋予故事巨大的情感力量。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能够想象当时的情景。

表述不够准确，应当是低视力（低视力的定义为矫正视力等于或高于0.05，低于0.1）

学校的名字需要查证准确。应当是原安庆盲哑学校（现名为安庆特殊教育学校）和青岛盲校。

需要使用老师的姓名。

应当涉及其它大学如何处理视力障碍的学生。还可以拓展到视力障碍人群如何接受教育，展开更广泛的讨论，从而跳出事件本身的范围。

校方主动找到王宠称，由于其视力状况，入住宿舍存在很多不便，“出于安全考虑”，学校不为其安排集体宿舍，而要求王宠在有家人陪同的情况下，在校外租房住。

出发北上前，王庭槐做了很多打算，他告诉新京报记者，由于担心视力带来生活上的不便，自己打算“好好跟舍友、同学、老师叮嘱”，拜托他们多照顾王宠。面对校方不容置辩的口气，王庭槐发现，自己有些“想多了”。

昨日，新京报记者联系东北师范大学校方及数学与统计学院方面，均未得到正面回应。王宠的辅导员，一名邵姓老师称，“不方便谈论”此事。东北师大校方一名要求匿名的内部人士表示，王宠系该校录取的首位盲人学生，此前学校并无管理这类学生的经验，要求其在外租房住，并有家人陪同，是为“安全起见”。

昨日，王庭槐告诉新京报记者，经过与校方协调，学校将以按月发放补贴的形式，承担王宠在校期间的房租。此外，数学与统计学院一名负责人口头向王庭槐承诺，如果其留下作为陪读家长，学校可帮助提供一份工作。

## 对话

### 盲人学生王宠

#### 不能住宿是大学生活的缺失

王宠未来四年的“家”，是一套刚租的两居室，月租金 1600 元，位于东北师范大学附近，走路到校不到 20 分钟。相比空间不大的集体宿舍，这里显然宽敞、安静很多，但电话中王宠的口气显得失落。在他看来，不能入住学生宿舍，无法体验集体生活，是大学生活的一种缺失。

“至少应该拥有完整的同学关系”

新京报：对现在住的地方还满意吗？

王宠：现在能够接受了，这里条件还可以。但是如果能够有选择，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能够住到集体宿舍去。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要一间学生宿舍？

王宠：我之前想象过上大学的感觉，应该就是集体生活，跟舍友一起相处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好。我觉得集体生活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的身体有一些问题，但是至少应该和其他人一样，拥有完整的同学关系。

新京报：完整的同学关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宠：高中读的都是盲校，接触的也都是盲人。相对来说，人际关系这一块比较欠缺，一直没有太好的朋友，一直比较孤独。本来希望能够在上大学后，在宿舍找到知音朋友，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了。

其实学校出于安全考虑这么做，我能够理解，但是希望也能为我考虑下。我的视力虽然比较弱，但是感觉平时走路、生活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并不需要人照顾。

### “不希望被区别对待”

新京报：盲人参加普通高考，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王宠：整个考场就一个人，有三个监考老师。时间上，比普通考生延长一半，然后自己要手写盲文。第一场比较紧张，但是后来就好了，反正和平时做练习没什么区别。

我们青岛盲人学校一共 5 个人参加普通高考，我应该是考得最好的，感觉有机会当老师了。

新京报：为什么想做老师？

王宠：一方面是我在学校受到很多老师帮助，另外自己感觉比较适合做老师。我在数学方面理解能力还比较强，愿意学习，也经常帮同学讲题。

新京报：怎么看待现在的遭遇？

王宠：有点失望，来的时候不知道会有这么多麻烦，就是很高兴。之前知道有政策，盲人也能报普通高考，以为我们可以跟正常的学生一样了。可是到了大学才发现，学校这方面没有配套措施，我还是被区别对待的，这一点我不想。

新京报：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王宠：当下，还是希望能够协调，让我入住学生宿舍。未来，不知道能否和普通同学一样能够公平就业，现在残疾人遇到的障碍还是挺多的。如果有可能，希望去盲校教高中数学。

### 律师说法 学校应该提供宿舍

《残疾人保障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普通教育机构对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人实施教育，并为其学习提供便利和帮助。第六十三条规定，有关教育机构拒不接受残疾学生入学，或者在国家规定的录取要求以外附加条件限制残疾学生就学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常清称，东北师大拒绝为王宠提供宿舍，实际是一种歧视性待遇，“仅仅因为王宠是盲人，本人又不同意住校外，校方应该提供宿舍”。

这不是律师的声明 - 新闻内容与副标题不符。

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歧视性’这个词。需要做出准确定义并解释为什么是一种形式的歧视。是否区别对待，做出不同的安排或者给予特殊照顾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歧视？

## > 辅导提纲

### 思考题：

- 这则新闻报道中如何称呼和描述王宠？
- 本文作者将学校拒绝王宠校园住宿的经历置于什么样大的社会情境下进行解读的？
- 直接引用记者和王宠之间的对话如何有助于故事的整体叙事？
- 报道中如何描述残疾人士的？

### 报道残疾议题的提示：

- 关注报道残疾人群面临的问题
- 避免使用带有贬义污蔑性质的词汇称呼身体有残疾的人，比如残废 / 残废的 / 残障，残缺，聋哑人，智障，畸形人或缺陷人士
- 避免使用“正常”和“健康”这两个词来形容没有残疾的人
- 避免使用诸如“有勇气”，“勇敢”，“特殊”或“超人”之类的词汇形容残疾人，因为这暗示所有残疾人都应具备某种非凡的才能
- 尊重报道对象的生活，尊重个人的声音
- 耐心倾听并使用更多残疾人自己的声音和视角，而不是无残疾群体如何看待残疾人
- 尽量提供社区服务的使用信息，比如社会保险和医疗护理等方面的相关信息

### 推荐阅读：

- Briant, E., Watson, N., & Philo, G. (2013). Reporting disability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the changing face of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disability and disabled peop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folk devils’ . *Disability & Society*, 28(6), 874-889.
- Zhang, L., & Haller, B. (2013). Consuming image: How mass media impact the identity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1(3), 319-334.
- Goggin, G., Newell, G., & Newell, C. (2003). *Digital disabilit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sability in new media*. Rowman & Littlefield.

# 第十三章 X 社会地位

新闻记者报道社会地位议题的手段和方法因文化而异。常用套路是将富人描绘为成功卓越人士而穷人却要为本不是他们所造成的贫困担责并备受责难 (Cozzarelli, Wilkinson 和 Tagler, 2001), 这种套路和论调比较符合特定社会各个意识形态阵营的基本认知。本章我们将重点关注媒体对贫困和接受社会福利人群的刻画。媒体的报道框架通常将贫困问题归为个人行为过错 (Beddoe & Keddell, 2016 年)。研究表明, 媒体报道和政治舆论相互合作, 互为补充, 将穷人归类并加以抹黑 (Mooney, 2009)。以此来淡化贫困问题在选举中的重要性, 便于将注意力放到更容易吸引选民选票的其它议题上。公民如何看待贫困议题取决于媒体如何设定报道的框架 (Iyengar, 1990)。基于证据的新闻报道可以证实贫困的存在是社会系统失效的表症, 从而更正贫困是由个人行为错误所导致的报道框架。在贫困的议题上, 新闻媒体理应提供一个平台供大家展开战略性的辩论和探讨, 提供直面社会不公的机会 (Haas & Steiner, 2001)。而事实上媒体却倾向淡化贫困问题, 无视低收入人群的诉求和存在, 与之对经济商业新闻的资源投入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 经济新闻获得越来越多的报道空间展示创造经济增长和金钱的机构和个人, 几乎很少关注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

克劳森和特里斯 (Clawson and Trice, 2000 年) 对贫困的讨论表明, 媒体上对穷人大加指责并对他们污名化, 将穷人描述为犯罪分子, 懒惰, 吸毒, 没有任何兴趣爱好, 毫无兴趣敢改变自己的处境; 事实上这些论断毫无证据支持。除此之外, 讨论贫困人群的时候, 媒体还经常含沙射影, 将他们与下等阶级, 城区的某些病态行为联系在一起 (Gans, 1995)。费尔克洛夫 (Fairclough, 2000) 认为, 新闻记者正在错过一个绝好的为社会变革做贡献的机会, 此时此刻政治正在变得日益媒介化, 实际上为媒体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围绕贫困等社会议题的辩论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在中国, 媒体报道更为常见的是聚焦国家有关精准扶贫的政策而不是单纯关注贫困或富裕的个体人群。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颁布之后, 可以明显看出贫困议题报道模式的转变。例如, 人们对贫困和减轻贫困的现状有了更多的思考, 更多地关注了穷人的声音。记者走在扶贫第一线, 深入调研扶贫政策实施和落实的情况。(Wei & Chen, 2020).

## 思考如何设定报道的框架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05/c\\_1123808227.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05/c_1123808227.htm)

该新闻报道试图讨论“福利化”低保补贴带来的社会问题。报告社会问题时，应该依据事实准确表述，避免使用谣言和毫无事实根据的声明，但是本文的逻辑性以及文中使用的短语和句子结构的准确性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探讨商榷。

闹矛盾 养懒汉 诱发腐败

—— 低保 ‘福利化’  
造成诸多后遗症

低保本是“救命钱”，如今成了“唐僧肉”  
低保“福利化”易引发基层矛盾

这个标题只是涵盖了前两部分：1. 低保补贴可能成为‘特权’；2. 制造矛盾养懒汉变成福利政策的后遗症；第三部分低保补贴政策应当减少，应当加强特别资助，没有在标题中体现出来。

新华网，中国  
2018年12月12日

这个说法出自何处？如果是记者说的，需要有数据支撑这样的说法，如果不是，则需要指出信息的来源。

需要解释什么是‘人情保’和‘金钱保’？

这种说法经常用于新闻报道当中，但是含义非常模糊。哪里的农民？什么级别的基层领导？他们在做什么？

概括归类的话需要准确，不能一概而论。

哪个县，请具体说明。

记者是否查证过这些说法是否准确？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准确？需要标注信息的出处。

概括归类的话需要准确，不能一概而论。

该记者应当列举享受基本生活补贴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这种说法来自何处？如果是记者本人说的，那么需要数据和证据的支撑，如果不是记者的观点，那么需要注明信息的出处。

从哪里来的直接引语？谁说的？

农村低保政策是对低收入农户的兜底保障，对解决困难群众实际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基层采访了解到，各地通过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人情保”“金钱保”等乱象大为改观，但一些新的矛盾正在显现。

一些农民和基层干部反映，农村低保在保障低收入农民基本生活外，还加挂较高标准的医疗、助学、助残等综合保障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引发基层低保福利依赖和农户矛盾。

### 低保福利多或成“特权”

一些农民说，低保补助那些钱不算什么，可有了低保身份，看病住院能报90%左右，而普通户只能报60%左右，这很惹人眼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某县58岁的农民王丽枝2年前被查出肺癌，今年初领取低保，每次住院化疗费用，自己只出几十元。她丈夫说，前些年在城里打工攒下些钱，妻子得癌症花掉大半，吃了低保，大部分医药费解决了，全家还能体面地生活。“可有些人觉得我家占尽了国家的便宜，总在背后说风凉话，遇见邻里乡亲也觉得不自在。”

与王丽枝同村的一些村民说，村里谁家摊上癌症都会入不敷出，可如果吃上低保就能有这么优越的医疗保障，那还要新农合、大病救助干啥？把收入高却因大病支出多的人家纳入低保，既给钱，又给这么高的医疗福利，这对收入低、支出也少的非低保户来说不太公平。

部分低保边缘户，也对低保配套的医疗报销优惠政策有些看法。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农民马有今年63岁，因耕地连年歉收，长期外出打工，老两口年收入不足5000元，两个女儿的生活也紧紧巴巴。这些年，老伴治疗胆结石、子宫肌瘤和眼疾花了六七万元，手里的钱只够吃穿。

“比我家条件差点儿的评上了低保，免交新农合保费，电费也有优惠，看病还能报90%左右。我们一家老小每年交近千元新农合保费，住院却只能报60%左右，享受的政策比低保户差得太多了。”马有说。

与低保相关的助学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也让一些人有意见。记者多方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2014年出台低保家庭大学新生一次性补助3万元或4万元的政策，然而少数人钻空子，拿到钱就退学。有人看到低保户白得这么多钱，意见很大。后来，自治区完善政策，改为分年度发放资金，但直接给钱的救助方式，仍让部分人心里不平衡。

### 闹矛盾养懒汉成福利政策后遗症

低保本是“救命钱”，如今成了“唐僧肉”，搭载福利过多，让一些评不上低保的农民到处告状，或令一些人想方设法争低保、当懒汉，还诱使少数干部铤而走险、违纪违法。

争低保导致邻里不和、村风不正。记者走村串户采访了解到，低保福利高，引起农民激烈争夺，有些人不够低保条件、享受不到政策就到处告状，“这家儿子开宝马父亲吃低保”“那家儿子当干部母亲吃低保”……种种说法满天飞。而记者向多位村民、村干部和乡镇民政工作人员核实了解到，这些举报并非事实，但已搅得邻里不和，村里乌烟瘴气。

福利过多易养懒汉，有碍乡村发展。化德县 38 岁的农民小安，年纪轻轻却说自己没力气干活，农忙时还得靠上岁数的村民帮忙。村干部让他到医院检查鉴定，他却以没钱体检等理由不配合，日常生活还离不开烟酒。记者向他刨根问底并采访多名村民后得知，他看到低保户和贫困户政策好，也想当。“政府发钱，还给看病，孩子上学也有着落，不用费劲刨闹生计。”小安说。

化德县在哪个省？应详细说明。

需要解释福利化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

记者发现，农村低保的福利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部分农民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这样的说法需要证据支撑。

诱使少数干部铤而走险、违纪违法。一些地方民政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低保好处多、诱惑大，有人想方设法找关系、走后门，加大了基层干部的腐败风险。近期，赤峰市某旗通报 3 起基层干部骗取低保家庭新生入学金的案件，都是直接更换低保名单，违纪人员主要集中在村两委主要负责人，他们利用职务便利优先照顾亲朋好友、熟人亲信。

这些人指的是谁？是哪里的呢？需要明确说明。

2016 年，内蒙古西部某市核查发现，该市 48 名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监狱服刑人员和强制戒毒人员违规享受低保，造成国家财政损失 40 多万元，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需要有信息的出处。这一部分整体而言都是概念化的，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实例作为证据。

### 低保政策要“减负”，专项救助需加强

农村低保应实行“按标补差”，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在实施低保制度的同时，逐步建立各类专项救助，共同形成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是谁说的呢？报道记者的点评？还是引用的政策？不够明确，如果是记者的观点，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来支撑，否则的话需要注明信息出处。

2014 年，国家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使社会救助制度更加完善。不过，该办法规定的专项救助，主要围绕低保对象开展。

此处无需使用带有转折功能的词汇。

如今，低保捆绑了医疗、教育、助残等专项救助，负担过重，有悖低保政策的底线保障目标，也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公。“大病、残疾和孩子上大学是农民致贫的主要原因，应分别施策，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无需都放到低保政策的篮子里解决。”一位基层干部说。

这样的解读需要事实的支撑

要有基层干部的姓名或者加注‘不希望公开姓名身份’的说明。

不少基层干部呼吁给低保松绑，让低保和其他专项救助充分发挥各自功能，使各项政策的定位更加清晰，避免福利过多叠加。

过于笼统，需要精准具体的说明。

着力加大对大病患者的保障力度，降低医疗救助与低保的叠加度。目前，一些部门沟通衔接不畅、财政支持力度有限，一些大病报销比例达不到国家要求，农民自费负担较重，基层希望加大对大病患者的救助力度。

完善对残疾人的普惠性补贴，确定合理的补贴标准。特别是对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提供更有效的保障，从而使残疾人救助与低保政策松绑。目前，针对残疾人的专门补贴标准较低、范围有限，希望国家在加强对残疾人医学鉴定、提升鉴定权威性的基础上，对残疾人补贴提标扩面。

为什么这里突然提到残疾的问题？在此之前并未提到。整个文章是关于贫困人群和生活补助的。

实现教育专项救助与低保政策松绑。调整完善低收入家庭新生入学补助政策，加大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国家助学贷款的保障力度，让助学金和奖学金政策向低收入家庭学生倾斜，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改变命运，弱化直接给钱等粗放的救助方式。（记者 于嘉 朱文哲）

## > 辅导提纲

### 思考题：

- 这则新闻报道反映了谁的观点和声音？
- 谁在谈论，被谈论的又是谁？
- 标题和副标题是否与每个部分的新闻内容匹配？
- 这则报道是否有明确的逻辑线索可循？如果没有，是什么导致了逻辑含混不清，应当如何修改？
- 这则新闻报道中是否有关键论点？如果有，关键论点是什么？是如何展开和架构的？
- 报道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是如何被刻画的？
- 该报道中主要的故事讲述框架是什么？

### 报道性取向议题的技巧提示：

- 加强报道影响低阶层人群的社会议题，比如失业，无家可归和文盲等
- 应当多倾听社会地位较低或来自弱势群体的声音
- 验证来自各种信息源的论断
- 避免给社会地位低的人群贴上负面标签
- 涉及社会矛盾和紧张局势时一定要交待大的社会背景
- 将客观事实与观点分开，但要重视观点的相关表达
- 将低社会地位阶层的人群视为独立的个体，尊重他们丰富的历史和复杂的内心情感

### 推荐阅读：

- Lugo Ocando, J. (2019). Poverty in the news media: Continuities, ruptures, and change in the reporting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Sociology Compass*, 13(7), e12719.
- Clawson, R. A., & Trice, R. (2000). Poverty as we know it: Media portrayals of the poor.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4(1), 53-64.

## × 结论

95

新闻媒体在人类社会中应当发挥一系列的重要作用：帮助打造公共舆论，鼓励公众参与讨论社会热点议题，允许政策决策时不同观点的碰撞，对政府机构和仲裁领域行使“监督”职能。新闻场域在真实生活中本身就包含有各种多元化的观点，不同利益（媒体所有者，编辑，记者，管理者）之间发生碰撞和冲突，目的是为了相互制衡，确保任何一方的利益永远不会独占鳌头。

新闻业在定义身份和社会关系中以及作为一个中介调解者的地位，阻止了新闻场域成为哈贝马斯（1989年）所定义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尽管它符合哈贝马斯定义的第一部分，即公共领域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领域，可以在其中形成一些接近民意的观点），但它却不符合第二部分的定义：“应当保证所有公民都能进入这个领域。每次对话都会形成一个公共领域，而在这个对话中，个体会集结在一起组成一个公共团体”

（Habermas 1964，第49页）。哈贝马斯认为党派政治和对大众传媒的操纵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在这样的空间当中，某种利益代表和外在表象的分量可能会超过理性的思辨（哈贝马斯，1989年，第162页）。

手册中展示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教学当中可以使用这些案例来剖析新闻行业对社会意义的创造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通过强调有价值的做法 / 或寻求更好的行动方案，我们提出了包容性的理念以改进现有的新闻实践。包容性新闻报道具

有很好的潜力能够揭示和公开媒体现有话语体系中的隐线，重新剖析现有主流观点的合法性流程。包容性新闻已悄然兴起并寻求在现有媒体领域中提供多样化的视角和声音，可以将它视为一整套新的规范，编辑政策和报道实践的手段。包容性新闻理念根植于包容性民主政治的概念和一个相信能够超越所有个体形式平等的政治体制。包容性新闻关注的是新闻记者采取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和特殊措施来回应不公正的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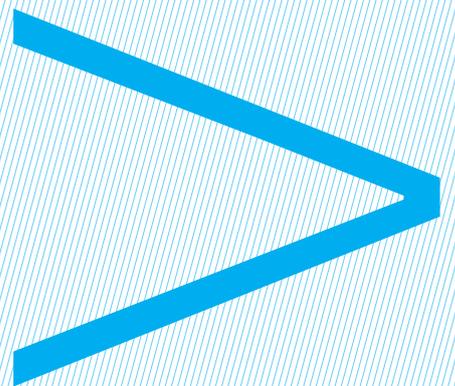
包容性新闻报道的目标是开拓包容性传播的能力，使得反思性的思维方式，社会，政治和文化多元的体验成为可能，可以接纳另类不同的群体并且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保持批判性的立场（Rupar and Pesic 2012）。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包容性新闻着眼于社会环境中人群的媒体呈现。新闻记者对信息来源的选择以及如何做出包括或排除的决定的时候与整个社会的功能差异划分紧密关联，当在社会中确定哪个群体在主流边界内，哪个群体在边界之外时实际上也是在定义谁被接纳，而只有知道谁被排斥在外，才能清晰定义谁最终被接纳。

民主社会将包容性视为其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判断标准。Young（2002）指出了两种社会排斥方式：“外部”和“内部”，外部排斥指的是群体和个人被公然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而“内部”排斥指的是“话语体系本身带有提前预设，内部因素之

间的互动倾向于某种表达风格”。内部某些人的参与会以捣乱为名而被驳回”（第 53 页）。Staheli 和 Stichweh（2002）在涉及包容和排除性问题的理论视角的概述中指出，“目前人类社会存在的功能体系面临着一个紧张对峙态势：一方面是呼吁包容接纳所有人的话语符号（例如，人权，公民身份的构建等），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排他现象”。在传播进程当中，那些被接纳的‘人’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团体的代表。将一个个体划分为一类人的一个代表的过程决定着包含与排斥之间的区别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学术界，新闻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尚未就社会包容性和排斥性的普遍定义达成共识。对于学者来说，最引人入胜的问题是媒体在社会排斥中扮演的角色。对于更广义的社会而言，社会包容是人们“鲜活的经历”和实际行动的一部分（Ewart and Snowden 2012）。对于新闻记者而言，报道贫困，移民，宗教紧张，不同性别的工资差距等议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和谐包容的理想社会与真实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问题将会一直贯穿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当中。

目前社会多元化，围绕少数人群权益问题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相关法制和法律的规范变革依然在进行当中，这些措施和行动都是建立在包容性社会理念基础之上的（Kymlicka, 2007 年）。新闻行业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在公共领域提供更加多元的声音表达。但是所有建立在社会包容理念之上的政策都必须强调每个个体获得日益增加的公平机会和深度参与（Mitchell 和 Shillington, 2002 年），新闻行业也是如此。



## > 参考书单

- Alexander, J. (1981). The mass news media in systematic,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E. Katz & T. Szecsko (Eds.), *Mass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pp.17-51).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llan, S. (1997). News and the public sphere: towards a history of objectivity and impartiality. In M. Bromley & T. O' Malley (Eds.), *A journalism reader* (pp. 296-329). London: Routledge.
- Allan, S. (2004). *News culture*. Maidenhead and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agdikian, B. (1988). *The media monopoly*. Boston: Beacon.
- Bandura, A. (2003).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for personal and social change by enabling media. In *Entertainment-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p. 97-118). Routledge.
- Bandura, A. (2003).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for personal and social change by enabling media. In *Entertainment-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p. 97-118). Routledge.
- Bandurski, D., & Hala, M. (2010).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Eight cases in Chinese watchdog journalism (Vol. 1).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Barnhurst, K. and Nerone, J. (2009). Journalism history. In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Routledge.pp.17-29.
- Beddoe, L., & Keddell, E. (2016). Informed outrage: Tackling shame and stigma in poverty education in social work. *Ethics and Social Welfare*, 10(2), 149-162.
- Benson, R. (2004). Bringing the sociology of media back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1, 275-292.
- Benson, R., & Neveu, E. (2005).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rkowitz, D. A. (Ed.). (1997). *Soci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reader*. Sage.
- Bourdieu, P. (1998a). *On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 Bourdieu, P. (2005). The political field, the social science field,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In R. Benson and E. Neveu (Eds.),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pp.29-48).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ist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 326-355.
- Cao, R. (2020)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framing analysis of the disabilities in China (2007-2018) Master thesi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ttps://kns-cnki-net43.webvpn.zisu.edu.cn/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2101&filename=1020440105.nh>
- Cheng, Y. (2012). 老年人与数字鸿沟：背景，现状与影响——对“老年人与互联网”的新闻报道内容的分析 (Seniors and the Digital Divide: Backgrou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act: An Analysis of the News Reports of "Seniors and the Internet"). *新媒体与社会 (New Media and Society)*, 03 (No.31), 225-244.
- Clawson, R. A., & Trice, R. (2000). Poverty as we know it: Media portrayals of the poor.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4(1), 53-64.
- Cottle, S. (2003).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Mapping the field. In Cottle, S. (Ed.),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pp.3-24).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Cottle, S., & Rai, M. (2008). Global 24/7 news providers: emissaries of global dominance or global public spher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4(2), 157-181.
- Cozzarelli, C., Wilkinson, A. V., & Tagler, M. J. (2001). Attitudes toward the poor and attributions for pover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7(2), 207-227.
- Dahlgern, P. (1995).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Sage.
- Dayan, D. &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Burgh, H. (2003). Skills are not enough: the case of journalism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Journalism* 4(1), 95-112

- DeFleur, M., & Ball-Rokeach, S. (1989).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Longman.
- Denzin N. & Lincoln Y.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Deuze, M. (2002). National news cultures: a comparison of Dutch, German, British, Australian and U.S. journalist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1), 134-150.
- Deuze, M. (2019). What journalism is (not). *Social Media+ Society*, 5(3), 2056305119857202.
- Donsbach, W. and Klett, B. (1993). Subjective objectivity: How journalists in four countries define a key term of their profession. *Gazette* 51(1), 53-83.
-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 Ewart, J., & Snowden, C. (2012). The media's role in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42(1), 61-63.
- Fairclough, 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 Fairclough, N. (1998).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medi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A. Bell & P. Garrett,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pp.142-163). London: Blackwell.
- Fairclough, N. (2000). Discourse,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The discourse of welfare reform.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2), 163-195.
- Franklin, B. (1997). *Newszak & news media*. London: Arnold.
- Feng, H. (2017) *The Disabled Consumed: Narrative Misconceptions in Media Coverage of Disability 被消费的残疾人——浅谈媒体残障报道的叙事误区*. *New Media Research*, 14:109-111
- Furnham, A., Mak, T., & Tanidjojo, L. (2000). An Asian perspective on the portrayal of men and women in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Studies from Hong Kong and Indonesian televis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0(11), 2341-2364.
- Gaetano, A. (2014). “Leftover women” : Postponing marriage and renegotiating womanhood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Research in Gender Studies*, 4(2), 124-149.
- Gans, H. J. (1995).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BasicBooks, 10 East 53rd Street, New York, NY 10022-5299.
- Gao, H. J.,(2015)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covered in People's Daily (1950-2014) 《人民日报》 (1950-2014) 少数民族形象建构研究*. Zhejiang University
- Garrett, P., and Bell, A. (Eds.). (1998).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Gauntlett, D. (2008). *Media, gender and identit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 Gauntlett, D. (2008). *Media, gender and identit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 Geertsema-Sligh, M. (2019). Internews: A case study of gender in media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5(2), 206-229.
- Geertsema - Sligh, M. (2019). Gender issues in news coverage.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Journalism Studies*, 1-8.
- Golding, P., & Murdock, G. (1979). 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 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 In Barrett, M. (Ed.), *Ideology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pp.198-224). London: Croom Helm.
- Gong, W., Tu, C., & Jiang, L. C. (2017). Stigmatized portrayals of single women: a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 coverage on single women and single men in China.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6(2), 197-211.

- Grasland, C., Lamarche-Perrin, R., Loveluck, B., & Pecout, H. (2016). International agenda-setting, the media and geography: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news flows. *L'Espace Géographique (English Edition)*, 45(1), 1-18.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6213770>
- Haas, T., & Steiner, L. (2001). Public journalism as a journalism of publics: Implications of the Habermas–Fraser debate for public journalism. *Journalism*, 2(2), 123-147.
- Habermas, J. (1964).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aedia article. *New German Critique* 1(4), 49-55.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Hafez, K. (2011). Global journalism for global governance? Theoretical visions, practical constraints. *Journalism*, 12(4), 483-496.
- Hallin, D.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2005). Field theory,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comparative media research. In R. Benson and E. Neveu (Eds.),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pp. 224-244).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llin, D., & Mancini, 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 E.,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New York: Pantheon.
- Hilgartner, S., & Bosk, C.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problems: a public arenas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 53-78.
- Hillier, S. M., & Barrow, G. M. (2014). *Aging,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Cengage Learning.
- Hillier, S. M., & Barrow, G. M. (2014). *Aging,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Nelson Education.
- Holbert, L. & Zubric, S. (200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bjective & public journalism technique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21(4), 50-68.
- Innis, H. (1950).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Iyengar, S. (1990). Framing responsibility for political issues: The case of poverty. *Political behavior*, 12(1), 19-40.
- Jackson, R. (2013). *Fantasy*. Routledge.
- Ji, L. (2020) Racism of Covid-19: In the Name of the Disease - A Global Media Presentation of Covid-19 种族主义的新冠：以病为名——新冠肺炎的全球媒介呈现  
Academic Research, 3, 9-13
- Johnson, R. (1993). Editors’ introduction” Pierre Bourdieu on ar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R. Johanson. (Ed.)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pp.1-25).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lin, A., & Lemish, D. (2008). Mental disorders stigma in the media: Review of studies on production, content, and influence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3(5), 434-449.
- Kornhauser, W. (1968). The theory of mass society. In Sills, 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10 (pp.58-64).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 Koropecykj - Cox, T., & Pendell, G. (2007). The gender gap in attitudes about childles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9(4), 899-915.
- Kovach, B., & Rosenstiel, T. (1999). *Warp Speed: America in the Age of Mixed Media*. Washington D.C: Century Foundation.
- Kymlicka, W. (2007). Multicultural odysseys. *ethnopolitics*, 6(4), 585-597.
- Liu, G. H., (2013). The Image of Inner Mongolia in the Mirror of Western Media - New York Times as an Example 西方媒介镜像下的内蒙古形象——《纽约时报》为例,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1, 75-77

- Liu, L., Gou, Z., & Zuo, J. (2016). Social support mediates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in elderly people.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1(5), 750-758.
- Liu, H, Wei, M. J., Zhang, Q. (2012) A few questions about new reporting of the seniors). *青年记者 (Youth Journalist)*, 30, doi: 10.3969/j.issn.1002-2759.2012.30.007
- Luo, Q. J. (2012) The media presentation of "minority" issues under the framework theory 框架理论下 "少数民族" 议题的媒介呈现,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5:98-99
- Macharia, S. (2020). 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 (GMMP).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nde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6.
-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76). Structuring the "unsee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2), 18-22.
-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 McQuail, D. (2000).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McQuail, D. (2005). Book Review: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 266-268.
- McQuail, D., Golding, P., & De Bens, E. (Eds.).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Sage.
- Meng, S. Q., (2013). Misconcep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porting on Disadvantaged Groups: The Case of Reporting on Disabled People 弱势群体报道理念的误区与转型——以残疾人报道为例., *Youth Journalist*, 24:24-25
- Mitchell, A., & Shillington, E. R. (2002). *Poverty, in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Toronto: Laidlaw Foundation.
- Mooney, G. (2009). The 'broken society' election: class hatred and the politics of poverty and place in Glasgow East.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8(4), 437-450.
- Narramore, T. (2011).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Eight Cases in Chinese Watchdog Journalism [Book Review]. *China Journal, The*, (66), 209.
- Nelson, J. A. (2000). The media role in building the disability community.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5(3), 180-193.
- Neuman, W. R., Neuman, R. W.,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orris, P. (2001). The new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J. Bartle and D.Griffiths (E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ransformed: from Morrison to Mendelson* (pp.163-180). Basingstoke: Palgrave Publishers.
- Omi, M., & Winant, H. (1993). On the theoretical status of the concept of race. *Race,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education*, 3-10.
- Qin, S. Q. (2010)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Other in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中国少数民族的他者再现,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14:131-141
- Qiu, S. (2013). Study on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ontemporary newspaper news reports -The case of the People's Daily, China Ethnic News, and Xinjiang News 当代报纸新闻报道中少数民族刻板形象研巧——《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新京报》为例 *Journal of Ethnic Art*, 2,34-38
- Ramasubramanian, S., & Oliver, M. B. (2007). Activating and suppressing hostile and benevolent racism: Evidence for comparative media stereotyping. *Media psychology*, 9(3), 623-646.
- Ren, C, X (2013) 《齐鲁晚报》老年人报道研究 (A Study on the news report of the elderly in Qilu Evening New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 Ren, X. (2013). *Urban China*. John Wiley & Sons.
- Rothrauff, T., & Cooney, T. M. (2008). The role of generativity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oes it differ for childless adults and parents?.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5(3-4), 148-159.
- Rupar, V. (2017). Inclusive journalism: How to shed light on voices traditionally left out in news coverage. Editor,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Applied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6(3)

- Rupar, V. (upcoming 2021). Revisiting the notion of public interest: journalism and the global immigration crisis. In Ward, S. *Handbook of Global Media Ethics*. Springer
- Rupar, V. and Pesic, M. (2012). "Inclusive journalism and rebuilding democracy" In
- Sakr, N. and Basyouni, H. *Rebuilding Egyptian Media for Democratic Future*. Cairo: Aalam El Kootob Publisher, pp.135-153
- Schramm, W. (1959). Comments on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1), 6-9.
- Schudson, M. (1997). Towards the troubleshooting manual for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3), 463-476.
- Schudson, M. (2001).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2(2), 149-170.
-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Shan, X. H. (2006) The Image of Yunnan Minorities in Newspaper Communication 报纸传播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 *Journal of Dali College*, 1, 45-49
- Shakespeare, T. (2004). Social models of disabi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Disability Research*, 6(1), 8-21.
- Shoemaker, P., & Reese, S. (1991).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White Plains: Longman.
- Stäheli, U., & Stichweh, R. (2002). Introduction: Inclusion/Exclusion-Systems Theoretical and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s. *Inclusion/Exclusion and Socio-Cultural Identities*.
- Streitmatter, R. (1998).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How the news media have shaped American history*. Westview Press.
- Thussu, D. K. (2006). Mapping global media flow and contra. *Media on the move*, 10.
- Titchkosky, T. (2000). Disability studies: The old and the new.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Cahiers canadiens de sociologie*, 197-224.
- Tomlinson, J.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London: Pinter.
- Tong, B. & Pan, R (2012). The Media Mirror of the Other: A Test of News Reporting and the Making of the Other "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 *Journalism University*, 2, 72-79
- Van Dijk, T. A. (2012).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racism. In *Migr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 15-29). Springer, Vienna.
- Vasil, L., & Wass, H. (1993). Portrayal of the elderly in the media: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gerontologist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9(1), 71-85.
- Vasil, L., & Wass, H. (1993). Portrayal of the elderly in the media: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gerontologist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9(1), 71-85.
- Wang, Haiyan (2010)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Five Newspapers' Reporting of the Chenzhou Mass Corruption Case, February 2004-November 2008*,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 Wang, H., Sparks, C., Lü, N., & Huang, Y. (2017). Differences within the mainland Chinese pres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2), 154-171.
- Wanta, W., Golan, G., & Lee, C. (2004). Agenda setting and international news: Media influence on public perceptions of foreign nation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2), 364-377.
- Weaver, D., & Wilhoit, G. (198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ei, Y. P., & Chen, D. F. (2020). 精准型政策范式下的中国扶贫报道研究 — 以 2013—2019 年《人民日报》精准扶贫的相关报道为例 (A Study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Reporting under the Precision-based Policy Paradigm--Examples of the Reports 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eople's Daily 2013-2019). *Journalism Lover*, 10, 94-96

White, D. M. (1950).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282-290.

Winter, J. (1997). *Democracy's oxygen: How corporations control the new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Wodak, R.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 In Gunnarson Britt-Louise, Linell Per & Nordberg Bengt (Eds.),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discourse* (pp.173-200). London: Longman.

World Journalism Education Council (2007).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Singapore. Available at: [https://wjec.net/?page\\_id=32108](https://wjec.net/?page_id=32108)

Wu, S.,(2014).The construction of disabled people's identity in news discourse 新闻语篇中残疾人身份的构建 . *Journal of Suihua College*.34(09):142-145

Xing, L. N. (2013) Analysis of Disability News Coverage in the Ethical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Xinjiang News 伦理视域下残疾人新闻报道分析——以《新京报》为例 , *Youth Journalist*, 33:45-46

Young, I. M. (2002).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ia*.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Zhang, C. (2018). “Leftover? No! I Am a Victorious Woman” Exploring the Identity of Sheng Nv in Contemporary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ang, C. (2020). “Leftover? I am a victorious woman!” –the potential for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omanhood.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6(1), 36-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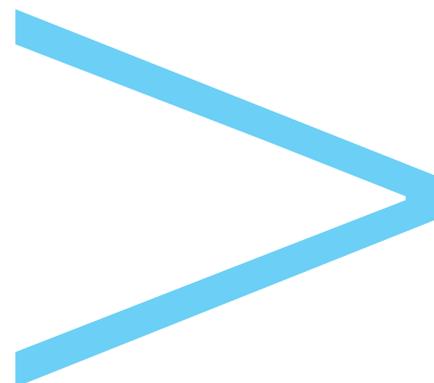
Zhang, Y. (2013) The Images of Ethnic Minority Images in Official Media: An Analysis of Ethnic Minority Coverage in People's Daily (1979-2010) 官方媒体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建构—基于《人民日报》少数民族报道的分析 (1979-2010),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6, 117-122

Zhao, Y. (2004).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media control in China. *Who owns the media*, 179-212.

Zhao, Y. Z., (2017) 作为政治的传播 : 中国新闻传播解释史 (Communication as politic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China

Zinsser, W. (1994). *Speaking of journalism: 12 writers and editors talk about their work*.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UN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FJ Code of Ethics



XX